

2-213



文化協會叢書(四)

630
285
2

800142

戰後中美文化關係論叢

孔祥熙題



中美文化協會

宗旨 研究中美兩國文化及促進中美民族間之邦誼

地址 重慶上清寺（電話二六〇一）

職員（三十二年度）

名譽會長 蔣宋美齡 史汀生

會長 孔祥熙

副會長 陳立夫 胡適 楊愛德 艾德敷

秘書長 陳炳章

副秘書長 吳開天 武道

會計 銳 樸

總務秘書 章 楚

中文秘書 任鴻隽

英文秘書 潘光迥

聯絡秘書 鄭耀坤（中國） 孟 治（美國）

各委員會主席：

財務 陳 行

會員徵審 季澤晉

交際 際 黃仁霖

編輯 輯 袁同禮

研究 究 劉大鈞

社會服務 務 張藹真

廣播 播 曾虛白

講座 座 任鴻隽

會員通訊 訊 馮國楨

基金保管 管 陳 行

會所管理 理 鄭耀坤

戰後中美文化關係論叢

目次

序一	孔祥熙 (一—二)
序二	陳立夫 (三—四)
引言	陳炳章 (五—六)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李絜非 (一—二)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樂森璧 (二三—四九)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袁同禮 (五一—七九)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陳錫康 (1—38)



3 0662 4259 9

no. 3835

901.14
5083

孔會長序

中美文化協會以所徵戰後中美文化關係論叢索敍於余。余惟文化者一國家民族學術思想性行之表現於政事民俗，大而經緯天地之業，細而日用服食之微，無不統攝焉者也。夫一國民族文化之高下，常爲國勢強弱族性興替所繫，而其爲物非一成不變，固定而不可移者也。其爲用也，相通流而無所礙，常因觀摩而益進，以融匯而益新，一民族與一民族之相互翕受推進，以益增其昌明廣力，此有史以來所不絕書，而人類文化所以進無止境，國際友情所以日益敦睦者也。

原夫世界文化之發展，本分東西兩大主流。東方文化以中國爲中心，自羲皇立國中原，五千年來，聖賢述作，繼繼承承，源遠流長，發揚光大，造成崇高優美之華夏文化體系，以普惠東方諸民族。西方文化導源於埃及，沿地中海岸而西進，而希臘、而羅馬、而西歐各國，以漸及於美洲。而今日之美國，實承泰西五千年之文化，而集其大成。其科學之發展，經濟文化之優越，更爲舉世所不及。海通以還，美國人士，遠來中土，傳教興學，嘉惠士林，通商興業，促進開發，於是東西文化，日益溝通，而科學文

明及物質建設之傳播觀摩，更有益於我國。近年中美兩國社會領袖，宿學大師，往來日繁，講學日盛，國交益親，友情日洽，意者東西文化之合流，將以此為始基乎。

夫中美兩大國家邦交之敦睦，民族情誼之融洽，既為世所共知，而挈其類似之點言之，幅員之廣大同，人民之衆多同，國體之皆為民主則又同，而華人服膺孔道，崇尚仁義，與美人崇信耶教，博愛為懷，則其文化精神，亦無不同。此次大戰，中國首抗暴日，美國誓覆納粹，其抵抗侵略，維持正義，以促進世界永久之和平，彼此同心。在戰爭進行之今日，中國既與美國並肩協力，殊死奮鬪，以消除人羣進化之公敵，在戰後世界和平建設，中國更必與美國繼續協力，以增進全世界之繁榮與幸福。更望我國人士，奮發精進，於努力光大我民族五千年之偉大文化外，對於美國之宗教教育科學文化，急起直追，媲美先進，完成我國建國大業，與美國共負實現民主國家維護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之責任，而使世界永受其惠，則此次中美文化關係論叢之刊行，其中美文化交流之前導也歟！

中美文化協會會長孔祥熙

陳副會長序

中美二國，峙立於太平洋兩岸，卓然爲反侵略國家之重心，其文化亦自集東西之大成，幾經孕育，造成今日之文明，對世界人類各有其重大之貢獻。

中國文化植基於儒家之正統思想，亦卽中國民族之中心思想，儒家之正統思想在「誠」與「仁」，歷代聖哲教人以誠，惟其誠故能擇善固執，自強不息，而成智仁勇之德，智可以知仁，勇所以行仁，故能見義勇爲，成仁爲樂，此種精神與基督之精神，初無絲毫之差別也。抗戰六年震鑠一世之表現，誠與仁之發揮而已。

中美兩國歷史雖有久暫之不同，而國民仍有共同之性格，卽均具有愛好和平，反對侵略之深切信念。今日兩國人民反抗軸心，堅決奮鬥，共同爲正義人道而戰，決心實在於使世界和平永固於將來，亦卽其共同信念之表現。

防止未來世界戰爭，樹立世界永久和平，其道多端，言人人殊，但在軍事政治經濟方法以外，究以改造思想爲最徹底。思想曷由而改造，是非提倡中國固有文化不爲功，中國固有文化之精神，亦卽「誠」與「仁」所引申之政治哲學。質言之，戰後世界各國

倘能實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則天下平，而帝國主義，自永告絕滅於世界。科學進步，將不為侵略家所利用，而轉變為人生服務，戰爭可弭，永久和平乃得奠定。

中國雖以文化崇高聞於世，顧百年來，因清政之失綱，世界情勢之劇變，釀成技術之落後，引起外力之侵陵。反觀美國，則具歐西文化之菁華，其人民富於進取，有新生力，科學思想與方法最稱發達，用能構成富強康樂之現代國家。中國戰時雖幸而基於固有文化發揮堅苦卓絕之精神，得以制勝克敵；然鑒於科學落後之慘痛教訓，戰後工作自應以實業建設為重，其目標當以科學化工業化為核心。肩建國鉅任之青年，非特應繼承先哲之經世精神，發揚光大，以藥世病；尤當運用現代科學智識，效法美國，迎頭趕上，取長補短，庶幾能保證國家之富強，人民之安樂。而中美二國之友誼，亦必以文化之交流而愈敦睦。

中美文化協會以「戰後中美文化關係」為題徵文，最錄四篇，刊成專冊，乞余一言，特貢所感，用代序言。

中美文化協會副會長陳立夫

引言

中美文化協會之成立，於茲四載，以事屬草創，人力財力俱感匱乏，除普通會務外，對於文化事業，初未能擴大舉辦，客歲八月，會所落成，共慶維鵠之有巢，爰經釐訂具體工作計劃，次第予以實施，如摘譯美國報章，如舉辦文化講座，如放映文化影片，如舉辦對美播講，如刊印文化叢書，如辦理職業介紹，如指導有意留美學生，如編纂留美學生名錄，如設置公共閱覽室，餉讀者以由美航運之最新刊物，如開辦招待所以招待中外文化界人士，如捐款設立陪都兒童遊戲場及其他社會服務，如定本年五月為「美國軍人月」分請會員個別招待在渝美國軍人，如羅致專家從事研究著述，以餉中外關心中國文化之讀者，如在中美二國同時懸獎徵文，以提倡中美文化關係之研究等，均獲得海內外人士之同情與贊助。

本輯乃最近國內懸獎徵文所得之第一，二，三，名三篇暨得榮譽獎之一篇彙集而成，即以「戰後中美文化關係」為題，應徵者凡男女四十九人，北至陝西城固，南至雲南昆明，東至福建汀州，西至西康康定，地域之廣，幾與全自由中國相埒。應徵之年

齡有高至六十八歲者，有年青至二十三歲者，其中醫生有之，律師有之，工程師有之，軍人有之，中學生有之，大學生有之，公務員有之，大學教授亦有之，足見國人之關心中美文化關係，不限於本會會員，而欲見其發揚光大，成爲戰後世界和平之基礎者，實繁有徒也。

此次主辦懸獎徵文，荷蒙美國學術資料服務社主任費正清博士、中央研究院祕書長葉企孫博士、本會研究委員會主席劉季陶博士擔任評判員，榮幸之餘，尤深感激，特此誌謝。

至得獎人之姓名，早經登報發表，並致送獎金，茲再將各著者簡單履歷，附列於後，以資介紹，而示欽佩。

中美文化協會祕書長陳炳章識

中美文化協會懸獎徵文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得獎作者履歷

第一獎 李絜非

安徽嘉山人，現年三十五歲。民國十九年國立中央大學畢業。曾任中等學校教職員及圖書館主任等職五年，浙江大學教職員七年。現任浙江大學史地系副教授。新著有東北小史，歷史教學法，中美關係等三書。

第二獎 陳錫康

金陵大學學士（一九三三），美國西北大學碩士（一九三八），耶魯大學研究員（一九三八——一九四一）。現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

第三獎 樂森璧

字伯衡，貴州黃平人，現年五十六歲。清華學校畢業，美國耶魯大學理學士。曾任貴州實業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貴陽南明學校工業特科主任，前農商部商標局技士兼審查主任，美國巴拿馬博覽會視察員，華

洋義賑會貴州分會幹事並赴京滬代表。現任財政部國定稅則委員會商
品股主任。

名譽獎

袁同禮

河北保定人，現年四十八歲。國立北京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
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倫敦大學歷史研究院、巴黎神科學校畢業。曾任
國內外各圖書館及文化機關職務，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作者
事先聲明不受獎金）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中美兩國間的文化關係，早經存在。法國中國學者岐尼（D. G. Deshayes）為深受了馬可索羅遊記（*Travels of Marco Polo*）的影響。而十二世紀中國人所發明的羅盤針，由阿拉伯人以傳入歐洲，使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方敢越地中海的雷池而遠航大洋之中，哥倫布便是承其實惠的一人。約翰弗斯克（John Fiske）於北美洲一書中，言之甚審。此兩種間接與直接有助於美洲發見的文化禮物，是最先中國於無意中惠與了新大陸。

自新大陸的發見後，中國於十八世紀末所予歐洲人藝術上的影響，亦被移植於美洲的歐洲人攜以俱往。如中國式的建築，美飾用的壁畫，以至中國的漆器古玩，地毯屏風，皆引入新大陸居人的生活中。及至美國於一七七六年獨立，中美間發生了直接關係，更以交通工具的不斷進步，文化交流亦於焉日益增廣。一八四四年，中美間最先締約，規定有美人在華宣揚耶教的事。一八二九年，美籍第一位教士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自美來華。而中國的第一位留學美國的學生容闈（純甫），便是一八五三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是受美國教士教育的一人。中山先生於十四歲時，曾至火奴魯魯受美國教育和科學知識。一八六七年，中國政府「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派了在華退職的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旅次華府時，曾與美政府訂有中美續約八款，其中有當時中國對外條約中最先有遊學條款之規定。中國當時於積弱之餘，亟思振興，一八七二年以次，接受了容闈的條陳，先後派幼童四批百五十人赴美留學。一九〇八年，以羅斯福大總統的命令，退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以福利中國人民。中國接受了這番好意，「非第酬答與國之情，實兼推廣育才之計。」（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國外務部學部會奏遣派學生赴美留學摺中語）因於每年遣派學生赴美留學，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範等科，一九〇九年，即行開始派遣，同時在北京設清華學校，以為肄業館，作赴美留學的預備學校。自是清華一校學生赴美留學者，每年自四十人至八十人左右不等，截至民國十八年止，先後達二十年，凡造就留美學生千二百人左右。而同時私費留美學生亦與年俱增，一九二五年的調查，中國佔九十七國籍留學美國學生總數百分之二〇·七九，高居首位。此等留學生所容受的為美國之新文化，美國的生活型式，

亦多攜以俱歸。而中國人除遊學外，僑美人士雖經美政府法令於十九世紀末一再限制，但經常亦有數萬人，寓居太平洋沿岸和紐約等地，美政府又持同化外人的政策，當然脫不了彼此文化發生交流的作用。抑自中美貿易日益增加以來，美國人士僑寓中國的亦與年俱增，最多達萬二千人，商賈而外，從事傳教業醫者，更不乏其人。美人以其信仰上的熱忱，中國國土之上，幾於無遠弗屆。而新式醫學影響中國尤大，美國本國人士更能作桴鼓之應，捐資在中國各地興建教堂醫院，設立各級學校，作為三位一體的事業。中國既與美國長期間的邦交無間，日趨和睦，更信賴彼邦人士，政府外籍顧問和學校外籍教師，俱以美國佔居首位。美國人士之研究中國學者，蒐訪中國書者，亦後來居上，頗多成績。其以科學方法局外人的長期觀察所得寫為專著者，如費利門(John R. Freeman)之於黃河問題，甘末爾(Kammerer)之於中國幣制，韋羅貝(W. W. Willoughby)麥克納爾(Henry Farnsworth MacNair)等之於中國國際問題，雷瑪(C. F. Remer)之於中國國際貿易，楊格(C. Walter Young)之於中國東北問題，維理士與勃賴克章爾特(B. Willis & Blackwelder)勃吉與毛力士(C. P. Berkey & F. K. Morris)等之於中國地質，杜威(John Dewey)衛西琴(Alfred Westhard)等之於中國教育，皆極為中外人士所重視。近年以來，美國書籍尤以大學課本如數理化外國史地，皆為中國高中以

上學校所引用，試驗器材亦不斷自彼邦運來。社交風尚，更以好萊塢的電影而多所影響。反之，中國文化既有其和平的一貫的精神，愈近亦愈受彼邦社會人士的重視。美國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皆先後有中國人在傳授中國文化。更有不少留學生以所承受於彼邦科學教育所得，更進一步有所創造發見，以爲攻玉輔仁之資。而除科學上的著作發表於彼邦專門雜誌外，亦有不少中國文化各方面的介紹於彼國人士之前。近頃林語堂氏若干新著之廣受彼邦人士歡迎，已可見其一斑。

由歷史上的敘述，可以見中美文化的關係：中美邦交即以文化因素佔居重要的地位，開始是中國文化影響美國，繼而所謂「歐風美雨」以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橫掃中國，而大量輸入中國以歐美文化，十九世紀中，使中國真正接觸西方文化，這不得不歸功於交通方法的迅速。及至二十世紀初，「五四」運動中，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的呼聲，響徹全國，實以留美學生爲其中堅。一九一四——八年的歐戰以後，中國人士以受戰爭慘劇的激刺，一變前此唯歐美是尙的態度，而爲審慎抉擇的態度，更謀兼取二者之長而構成一種新文化，以自救救世。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是其最博大精微的結晶品。而中國的真正文化得受新方法的洗禮，以中外學者之努力，亦方興未艾的正受彼邦人士的愛尙。

過去百五十年之中，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雖自上而下，欲行卻顧，無疑的深受美國大量的影響。更以美國人士多懷熱忱，以一新中國爲任，欲使中國改觀，中國於一九一一年既成爲共和國，太平洋兩岸成爲兄弟之邦，魯衛之政。而民族主義的思潮，德謨克拉西的理想，天賦人權的學說，來自美國和法國的，同樣的憧影於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心頭。科學的態度，批評辨別的精神，功利主義的觀念，平民教育的運動，更以美國的一再成效卓著，而益激盪於中國社會。但以其範圍之廣，形式之繁，舉凡人生一切事務，由日常的衣服玩好食物，以至倫理宗教觀念，既受此種新文化的浸潤，社會制度如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亦莫不受歐美文化的洗禮。馴至泥沙雜下，中國舊制幾有一舉盡棄的趨勢。但以中國文化複雜，尤其根深蒂固，尙能危而未傾。及至三民主義風靡全國，國人乃能一變輕舉妄動一切以舶來是尙的態度，而爲慎思明辨抉擇至當的行動。中國古語說的好：「事異變，成功大。」迄今正在擴大中國文化領域，引入美國的自然科學和機械工業的方法和成就，以一新此有特異傳統精神的文化。此匪但中國之幸，實亦美國之麻。

進一步的，我們對於中美文化，應予以簡單的說明和體認。考文化（Civilization）一辭，含義甚廣，舉凡衣食住行行政教，於某一特定生活範圍內所表現的各殊之樣式皆屬

之。在歐美原文意義，指爲生活的方式，所以大而禮樂制度，小而一身之事務，一家之宮室，皆在其範疇之中。中國文化爲最古文化碩果僅存的一種，在外表視之，似少變化，而跡其集累的過程，實不斷的吸收外來文化，而益擴張和加深。論其內容：秦漢時統一上古的中國而建立一大帝國，同時卽已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自是自東漢以迄明季，是爲印度文化輸入中國和我國固有文化由牴牾而配合的時期。自明季以迄今日，則爲中印兩種文化已告成熟而歐美文化相次輸入相激相盪而將相合爲一的時期。其中尙有薩拉森文化，凡此諸種文化，皆對於中國文化有重大激刺而促其發生變化作用。所以中國文化，至爲複雜而多變化。但中國文化雖有盛衰之判，而無中絕之時。易言之：卽始終未嘗喪失其本質或特色，此種本質或特色，卽以倫理的或道德的價值，作爲一切生活方式的標準，其在世界上自具卓特不可或少的地位。時賢論者以爲有下列五點爲其特色：（一）爲世界最純粹的文化——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至中山先生，五千年來，一脈相承，在世界歷史上實罕其儔。（二）爲世界發達最早的文化——以儒家的六藝爲基礎，而六藝備載堯舜以來的文章典物，舉凡政治道德法制學藝等，均於四千餘年前粲然大備。（三）爲世界史蹟最富的文化——中國史官建置最早，乙部文獻保存最多，近人統計中國有書籍六八六三三部，六〇八四七五卷之多。史書至少在十五萬卷以

上。(四)爲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以古代文明國家的歷史言，大都文明中絕，以近代各國歷史言，其建國統一，如英不過千餘年，美不過百七十年，惟有中國的歷史，自黃帝始距今已五千年，自殷商鑿確有據的歷史始，距今幾及四千年，纒纒相續，綿延繼武。所以以立國悠久言，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上，實佔居第一位。(五)爲世界最大民族推行的文化——就中國人口言據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爲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語言統一言，爲世界流行同一語言文字最廣的民族，以推行此純粹統一的文化，實爲有史以來未嘗或見的現象。

美國的文化，實爲近代歐洲文化的肖子。而近代歐洲文化之最可注意的：則爲個人意識的覺醒，國家思想的發達，與追求無窮的進步。此三種精神的糾結推進，形成所謂「機械文化」，充分表現出歐美人思想的特徵；於複雜中求統一，施以強有力的組織。美國國民更得天獨厚，變本加厲，青出於藍，好大喜功，常動樂競，以機械爲萬能，窮有生以治業，視世間無不可爲無不可成者。以政治上的成功與經濟上的繁榮，益增其獨立性與自信心。迄今已在領袖世界，斡旋乾坤。這在表面上言之，爲一種武力的優勢，而在其本質上言之，不啻是一種文化上的勝利。今日方興未艾，如日方中，其左右世界和人類歷史，絕不可忽視，蓋與中國文化有同等重要的價值與地

位。

中國文化和歐美文化，是各自累進，自爲體系。嚴復氏曾比較這兩種文化之所以不同，有如下種種的異處：（一）進化觀念的不同——「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二）政治思想的不同——中國的政治造成一種尊古保守的風氣，一切革新與競爭心都不會興起。故爲政者可以長治久安。西方則諸國並列，非競爭不足以圖存，因此執政者要百姓各方面都求進步。（三）政治制度的不同——因中國人思想守舊，所以政權終是在君主私人的手中。西人相反，政權多操於民。（四）教育宗旨的不同——中國祇希望造成少數的治者，所以僅重仕的教育。西人則善羣，以爲欲使國家富強，應使人民都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注意全民的教育。（五）學術思想的不同——中國人只知尊古，所以往往忽視古人的粗疎，不求精研。西人崇新，所以凡事都從粗淺中求其精深。此爲嚴氏根據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不同的影響，而比較其異處。張蔭麟氏則比較其發生史，就價值意識上、社會組織上和社會生存上三方面，予以比較，以爲至少自周秦希臘以來，兩方都有貫徹古今的根本差異。其在價值意識上，中國人對實際的活動的意識，遠在其對純粹的活動的興趣之上。實踐的價值（包括道德的價值而不限於道德的價值），幾乎就是價值的全部。反之，西方人對於純粹的活動，至少與對實際的活動有同

等的興趣。在西方人的價值意識裏，觀見的價值，若不是高出乎實踐的價值之上，至少也與實際的價值，有同等的地位。更以西方人不把實際的活動放在純粹的活動之上，所以西方人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中國人讓純粹的活動，被壓迫在實際的活動之下，所以中國人不能有更大的功利的成就。其在社會組織上，就家族在社會組織中的地位以及個人對家族的權利和義務而論，西方自希臘時代已和中國不同，西方經基督教一千數百年的訓練，使得犧牲家族的小羣而盡忠於超越家族的大羣的要求，成了西方一般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氣。後來基督教的勢力雖為別的超家族的大羣（國家）所取而代，但那種盡忠於超家族的大羣的道德空氣是不變的。那種道德空氣，是近代西方一切超家族的大羣，從股份公司到政治機構的一大羣固力，而為中國人過去所比較缺乏的。至少中國人到底還有調和忠孝的問題，而西方至少自中世迄今，則不大感覺到。其在社會生存上，過去中國的文化，始終是內陸的農業的文化。而西方文化，自其導源便和洋海結不解的關係，從十二世紀西南歐的準市府的經濟，到現代西方洋海帝國主義的經濟，是一繼續的發展，是一由量的增加而到質的轉變的歷程。這歷程和希臘羅馬的海外開拓，是一線相承的。而海外開拓的傳統，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這點差異從兩方的文學也可看出。此二者各有其利弊：「洋海的文化樂水，內陸的文化樂山。洋海的文化動，內陸

的文化靜。」而且我們也可以更進一步說，洋海的西方文化恰如智者尙智，內陸的文化恰如仁者尙德。洋海的文化動，所以西方的歷史，比較的波瀾壯闊掀揚，社會基礎的忽劇革命，頻見疊起。內陸的文化靜，所以中國歷史比較的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會的大變遷，都是潛移默運於不知不覺，而予人以二千多年停滯不進的印象。錢穆氏更進一步謂東方文化爲農業文化，西方文化爲商業文化。兩種文化各有其適宜的環境與條件，亦各有其獨特的姿態與使命，長短得失，互各有之。卻不能說有先後高下。並認爲人類文化必先由農業而進達商業。更謂最近之歐美文化，實有由商業文化再轉入農業文化的趨勢。其結論謂明日的世界文化，一定是一個近於整面的大全體的文化，一定是一種農業文化——一種受過新科學洗禮的新的農業文化。西方的新科學，一面在加速破毀他們的新文化，今日幾有成爲科學與文化衝突之象。在西方應該在與他們科學協調之下，急速創造他們的新文化。在東方，卻應該急學得他們的新科學，來護衛我們的舊文化，如此則科學仍將爲人類文化之最好工具，否則人類文化將見爲科學所毀滅。此次世界大戰之後，更爲維持人類永久和平計，更應亟謀合作，使兩文化體系進一步的發生密切關係。爲努力及此，兩國必須密切合作，站在平等立場，採取客觀標準——即排除淨盡出主人奴的成見及至其他如政治經濟優勢種色不同的影響，以爲取捨共信的原則。初之互

相瞭解，透澈認識，繼之截短補長，擇善而從。更由於文化的關係而及於其他一切政治經濟的關係，則今後必能實現中華民族所夙昔抱負的理想——世界大同之治，使人類趨於邦治之世。

嚴張錢三氏皆以中國人的立場，針對中國當前缺點，附作東西文化的比較而立言。對於中國文化方面，自難免有語氣過重的地方。但由上所援引的敘述，可見東西文化亦可說是中美文化各別，自有其短長。至於今日，以世界大勢所趨，更爲今後人類文化計，兩者已必需爲長短相劑調和發揚而爲一種明日世界的新文化。這固然爲事勢上的需求，亦屬客觀上的真理。基於以上中美文化關係歷史的敘述，以及中美文化本質的體認，作者得以作下面的八項具體方案之提供。

一、中美文化機關的成立和擴充——A、在中美兩國首都分別成立文化教育館。卽在中國首都成立美國文化教育館，而在美國首都成立中國文化教育館，負主持中美文化研究的專責。在中國各大學中的各系裏，已及早傳授歐美新科學，而所有英語文學系，更專講授英美的文學，史地系則多講授美國史地。反之，美國的公私各大學，亦多設有中國學講座，但終嫌其規模不大，設備無多，人員過少。望能以兩國公私之力，及早建立此等文化教育館，作爲兩國文化研究的中堅，交換的樞紐。此次戰爭之前，美國

哈佛大學曾與北平燕京大學以二十五萬元的鉅額經費，合作成立燕大哈佛社，出版學報多種，尤其對中國舊籍鉅著，作成不下二十種的引得，此種工作，至爲可貴。文化教育館應承其事，更擴而充之，將其他研究調查考察事項，基於中美文化世界學術的關係，作各種專題的研究和討論，更發揚而光大之。館中研究人員不分中美籍乃至他國精華中美文化的人士，皆得任事其中。至於專題的提出，叢書的編輯，地質地理的考察，氣候水利人類的測試，標本特產的採製等，亦將爲該館所總其成。以作者之才疏學淺，於此僅能偶一發其緒，詳細的釐定，將唯兩國學術專家是賴。B、中美文化協會的擴充——現已存在的中美文化協會，實爲富於國際性的團體。誠如顧維鈞博士所稱：「爲最適宜於國際合作的一種媒介。因此類團體，最易使各國人民，藉着知識的交流，而獲得互信互敬相親相愛的和平。」這種機關，以兩國文化知識之交換與兩國學術思想之普及於一般國民，爲其主要任務。這純是站在國民外交立場上所組成的團體，以力求民衆化普及化，應於首都設總會之外，於兩國各地，遍設分會。兩國僑寓對方國家各地的僑民，更以之爲兩國國民交際的場所，故其組織力求解除種種形式，寓文化於娛樂之中，使兩國人士相忘種族之別。該會更從之而設立短期或夜間語文補習班——按中國國民凡在初中讀書，皆已能閱讀英文。反之，美國人士近十餘年來，亦多已能解讀漢文與中國史地。

——定期通俗講演，以傳授兩國語文，明瞭彼此國情。總之，文化教育館爲研究的心，而文化協會則爲交換普及的機關，所有體有用，必能相得益彰。

二、交換教授與學生——已往美籍教授來華講學者，不乏其人。而據統計所示，總是佔居外籍在華教授的第一位。彼其人匪但以新科學的方法與結果，傳授與中國青年學子，使中國青年學子既習其文化，更增其愛好接納「彼美人兮」的情感。而在教者本人，置身異國，耳目一新，涵濡既久，必多心得，由以上所引諸種權威著述可以見之。至於特約來華講學者，彼邦知名之士如杜威孟祿之流，影響既大。而反之以講者的親切觀感所及，乃能一脫少數記者的以耳代目不確切之通訊，而誤解中國。更能進一步的同情於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不可或免的種種不健全的現象，而樂爲主持公論。至中國人之教學彼邦大學者，如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約翰霍布金斯密西根俄亥俄喬治撒安提克等大學皆有之。至美國學生之來華讀書，祇有少數僑民子女在教會所設立的大學中。其在中國設立的公私大學中讀書者，則絕無僅有。反之，中國學生留學彼邦者，則已往既盛，於今爲烈。抗戰之後，中國必須改變已往留學的制度，而多聘彼邦人士來華講授學術。文化的互相敬重，是國民外交最好的典型，爲了真理，而接受對方國家的學者講學，中美兩國已及早體認和不斷的行之有益，更由於學者之謙摛虛衷，必能移風易俗，

化除民族的成見，而互敬互愛，遍在與深入於兩國國民心理之中。中國於戰後，教育權更爲完全地收爲政府的任務，必能對美國學生之來華留學，特爲設備。誠然，中國是最早的有留學生的文化古國，唐宋兩朝，東亞各國，皆有留學生在中國首都長安求學。日本的大化革新，卽受唐代中國文化的影響。而中國朝野達官文人，更能懷遠人，樂周旋，使賓至如歸，樂且忘返。戰後，中國必能恢復當時盛況，抑且過之，實爲可以想像的事實。至於中國學者之講學彼邦，中國今後必能妙選人才，以糜彼邦人士之望。徵於中英已往交換講學的結果，中國皆慎重此舉，要派第一流的學者，以任其事。至於中國學生之留學美國，戰後亦必不會稍減其盛，爲求加速中國的現代化，以副美國朝野希冀中國爲太平洋彼岸強國，以爲安定太平洋的因素之厚望，必多派遣優秀青年赴彼邦專研自然科學和機械工業。更以美國工業環境的舉世無匹，必努力於科學的訓練與技術的學習，以補救中國過渡期間標本儀器乃至一切工業設備不足的現象。進一步的今後中美兩國學者專家，更當交換科學上的新發明，以造福於全世界的人類。

三、中美叢書的編輯和刊物的發行——中美兩國過去的關係和好無間，實爲令人愉快者之一事。但兩方對於對方國家史地文學等有特殊性事項的敘述，以傳達於其自國國民快，實嫌不足。戰後應由中美文化教育館與中美文化協會積極從事於此等叢書的編輯。

關於中國國民生活方面，如林語堂氏「生活之藝術」等書，皆可列爲叢書之一。其他孔子老子等古今哲人，可以代表中國文化者，乃至史地文藝，皆應有計劃有系統的編爲專書，或逐譯，或新編，以介紹中國文化於彼邦人士。反之亦然，美國的史地文藝以至一切生活，皆應撰以中文，用稔國人。我國過去曾譯有若干美國史地文藝作品，前者如俾爾德班茲鮑曼；後者如霍桑路易士賽珍珠的作品，皆有譯述，但總嫌其零星而無系統。今後應以兩國專家之力，從事於此。又過去威爾斯曾選中國「大學」一書爲世界十大著作之一，近頃美國大學讀物委員會，亦選林語堂氏的「生活之藝術」一書爲當代必讀書之一種，以後理應仿此精選中美名著，譯爲兩國文字，以廣流傳於兩國國民之間。抑在兩國大中小學課本中，應各分別寫入中國美國史地的專章，（如中國陳衡哲女士的商務西洋史，卽少美國一章，以後應予加入。）由兩國互相供給此種資料。至若在美國如納撒（Nathan）與孟根（Macken）所編「美人信仰（American Credit）」一書中所載中國人的信仰者，多屬言過其實，以偏概全的言論，有增加兩國國民歧視的地方，理應及早刪削。其他類此者的污蔑之辭，雙方皆不容其存在。刊物發行：美人在華所創之大美晚報華文版，頗得國人愛讀。雜誌之屬如「美亞月刊」「亞細亞月刊」，乃至美國國內各刊物，多敘述中國文字。而在中國國人所創刊如英文中國評論報，以及其他中文雜誌

之類，亦多有美國國民閱讀的作品。美國國內的專門刊物，國人更多以所發明，撰為英文，遠投海外。此後應由兩國分別發行專事介紹對方文化的刊物報章，如中蘇文化協會之刊有「中蘇文化」之類。此等專文，他日集腋成裘，更可為專書之要刪。

四、文物的交換——中美間自交通以來，中國對美有懋遷之利，美國對華，近更有通財之誼。戰後，更應擴大交換的範圍，各以特殊文物，加製副本，無條件的互為交換。譬如美國以國會圖書館，中國以中央圖書館分別主其事。先從書籍入手，各取其有關本國文化之敘述者儘先交換。最近報載如美國國會圖書館已藏有中國書籍二十萬冊之多。反之，中國各圖書館亦多庋藏美國書籍。美國新刊雜誌，更為各大學所必具，近因運輸艱難，則以照像影片輸入中國，複製成書，其相需之殷，可見一斑。而我國在抗戰之前，曾有影印四庫全書之計，並擬印成分贈友邦，今後偃武修文，自當舊事重提，實現前計，美國各大圖書館皆應獲得一部。其他如古物仿塑，勝跡圖影，皆可廣為投贈，互作瓊瑤之報。風尚所及，民間亦必能無所吝惜，公而忘私，出其所藏，以謀共賞。近年兩國政府，已開其端。兩國首長各皆以玉照寄贈，用代傾慕和把晤，此風必可繼盛。中國人一向對於嘉賓或友人，必有投贈以表忱曲，並視為禮節所必需，而獻詩贈劍，更示無上敬意。美國近頃之慷慨好義，為舉世人所共識。戰後文物之樂於交換，實無羶庸

言。中國人常說：「君子言義不言利」，即義重於利，而文物之誼，比諸貨資之有無相通，其意誼更重仟佰倍。

五、兩國國情電影的製映——電影屬直觀教育，近日活動電影與電視，已為普遍的應用。此在友邦，更其擅長與流行。近年以來，美國影片之風靡中國，佔此項入口百分之八十。青年男女，極端愛好，已視為生活享受的一種，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在中國男女青年口中，幾於如數家珍，其為效力，至堪驚人。但一向以商人牟利之需，漫無選擇的輸入，泥沙雜下，難免瑜不掩瑕。從之，對所自來的國度，作不甚合理的認識。今後應為代表美國真正文化電影的製造，大量輸入中國，廣事播放。反之，中國山川美跡，人物勝事，亦應多事攝為電影，映諸友邦都野。抗戰前好萊塢曾以賽珍珠女士的「福地」製為銀幕，至可稱許。電影為用，既可坐遊而不必起行，更可越國門一步，即能瞭解大洋彼岸之一切，使如置身異國，與遠人相晤對。抑且時間經濟，勝似讀一部書籍，使兩國人士作縮地交於一室之中，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六、文化節目的播送——無線電的廣播，已為現在宣傳的工具，如善用之，其在教育上的功效至大。已往各國所播送的節目，皆帶有宣傳煽惑的作用，不足為訓。今後世界恢復和平，必須善用此以為教育舉世民衆的有效工具，用使世界文化和平思想，日

趨於成熟，濡染薰涵之中，化往日的拘據畛域之見於無形，而唯中美兩大民族首其事。誠以中國民族有世界大同好愛和平的素養，而美國民族則有其實施的力量和使命。戰爭結束之後，為促進此兩大民族的文化關係，應於美國舊金山大電台與中國的真茹國際電台，逐日播送文化節目，或由兩國名人講演，或送兩國音樂歌曲。美國民衆既幾於家有收音機，習以成俗。中國戰後的推廣教化，亦必儘量利用此種新工具，而此種新工具，又為友邦人士既精且多的製品。兩國文化得互相介紹，互相啓發，假以時日，必能使愛好之者，更為崇尚。素昧平生者亦必以灌輸既久，引以為樂。太平洋兩岸直如庭闈，消國界於無形，久相忘於廣播聲中，誠為今後人類歷史上的盛事。

七、兩國名人的互相紀念——中國禮運大同之治，富有兼愛的思想。匪但超國界的飢溺為懷，痲痺在抱。抑且希冀人我兩利，偕登樂園。美國國民近頃亦能披髮纓冠，自救救人。今後更推之於積極的文化方面，視異國的古今名人，亦若己國的名人，推懷虛納，實為人類極大的美德。而所謂「中國日」「美國日」，亦既已行之有效。今後當取兩國世界性而大有造於文化教育的名人，互為尊尚，如美邦的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威爾遜愛迪生之流，中國的周公孔子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等，於紀念之餘，更大事發揚其所昌明的文化。過去如美國百五十年建國紀念，中國曾為印行紀念郵票。前者美國亦為中國頒

發「七七」紀念郵票。此種情懷，推而廣之，最堪珍尚。使兩國國民所仰止的古今先德，在對方國中，皆能家喻戶曉，必克大大增加文化交流的氛圍和成就。

八、發掘亞美間已湮的古代交通遺跡——近代學者有不少人力主美洲文化導源亞洲之說，德人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謂「據余觀察美洲刻石計時的方法，以及許多神話，俱顯然與東亞有相類似之點。此可證兩者古昔在歷史上的關係。」美國漢學家拉菲（Berthold Laufer）從而爲之言曰：「中國的影響於美洲，不在於有人或文化觀念直接由中國以及日本經過太平洋以至於美洲，而在於取陸道自亞洲東北部經過各民族內在的交通，逐漸過濾，以達於美洲的西北。」彼更明白爲言，大約在西元前二萬五千年至二萬年左右，亞洲曾自白令海峽或亞魯遜羣島數次向北美移民，至今美洲的印度人其體格猶與亞洲北部人民，極爲相似。惟亞美兩洲的文化，各自分途發展，歷時數千年的結果，在哥倫布發見之前，亞洲文明上基本的事物，多不見於古代原始的美洲人中。而至少在有史時代一兩千年內，兩洲會有密切的接觸，亞洲思潮及其伏流，曾掃美洲北部。拉菲氏以研究中國甲骨的結果，謂其有交通亞美非三洲的可能。氏頗置疑於楚齊（Chia-chi）愛斯基摩人的象牙雕刻術，在往昔或彼此互有關係。同樣，古代中國美術，與美洲西北部印度土人所有奇形怪狀的裝飾美術，或亦有歷史上的接觸，亦未可

知。因謂倘於阿拉斯加及亞洲東北部，作有系統的發掘，必可獲得無數的寶藏，使吾人震驚不已。這件事情關係於中美兩國的古代文化，戰後使能予以大規模的發掘，實爲至富意義。近日美加公路的通車，和中國國民堅決的表示必須收回東北失地，已象徵其主權所固屬乃至懷古之幽情爲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之事。以中美兩國對於考古發掘，雖屬後起，但皆已具第一流的考古學家，從事於此，對於兩國文化關係年代的引伸，使吾人於震驚之餘，其將欣慰鼓舞者，更將有不少活力與成就，發乎其中，而大有造於兩國之文化關係。

根據以上所敘述：我們由中美歷史的關係上，知道兩國自有交通以來，其間文化的關係，幾逾於政治的關係，即兩國有其濃重的文化關係經過與存在。更根據兩國文化之特點，而知其各具明日世界最重要的一方面的源遠流長之文化系統，雖有其差異，但相虛相劑，今後已有其客觀的事實上之必要與趨勢。由於相互作用，更得以相互激刺，而引起加速和發明不可思議的權力，因以世界人類永久和平幸福爲基點，而期爲明日合於進步需要的世界之新文化。作者卑之無甚高論，但提出初步的具體方案八事爲言。按中美文化系統，皆有其永久性普遍性與廣大性的特徵，太平洋上此日的交通利器如電視，已在應用，兩國文化關係的加強，與夫世界和平的保障，已不得不然。威爾斯「文明新

聖經的創造」(The Creation of A New Bible of Civilization)將唯中美兩國文化關係一體是賴。

國際文化合作關係，不自今日始。其行之有效的如關於策進觀察方法與計量標準的統一，如合作研究以謀學術的進步，如舉行會議以便相互間學者之交換意見者，中美間已及早行之，理應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如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世界教育會議、汎太平洋學術會議，中美皆曾加入，交換意見，分工合作。此次戰後，更應發揚光大。又如觀測日蝕，中美間學人亦曾一度分別在亞東美西一帶從事，殊途同歸，其關係自不容諱。而如兩國大學之頒贈榮譽學位於彼國之學者，中美間更多其例。其參加彼此學術團體爲會員，發表專著於學報者，中國學者之在美邦，亦不勝其枚舉。凡此諸端，一應力遵前修，所以便不在上面臚舉的方案中「畫蛇添足」了。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樂森璧

引言

文化一詞，就歐美學者廣義言之，即：「人類所以適應環境而生存之生活方式」之概念。在我國係由易繫辭「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語縮減而來。據清、彭申甫之註釋，則所謂人文者，「大而言之，則國家禮樂制度；小而言之，即一身之車服，一家之宮室。」準是，則文化者，統括精神物質兩方面，是亦廣義也。本文採取即此項廣義。

今國於太平洋兩岸之兩大陸國，東有中而西有美。就地理言之：並具寒溫熱帶則同；地大物博則同。就民族性言之：政尚民主則同；重人道，愛和平，又復相同。最近則於世界大戰中，更進而為軍事之同盟，駢肩作戰，共摧強敵。軍事、政治關係之密切若此，將來戰事弭平後，兩國文化關係，謀進一步之發展，實為必要之圖，當然之事。

戰後中美文化交流趨勢

(一) 我國勢應輸入之美國文化

美國文化，就大體而言，係偏於物質方面，如科學、工程、農礦、經濟、交通、醫藥、衛生、機械等等部門。美最爲擅長，最爲進步者，卽此等部門。反之，我國最落後，最缺乏，最需要者，亦卽此等部門。戰後建設，我國亟欲輸入，而且須充分輸入者，當然亦是此等部門。此爲衆所周知公認之事實，此文無予以詳加分析之必要。惟筆者對於應由美國輸入之是項文化，約有管見數端：

(1) 是項文化輸入後，應融化變通，俾適於我國國情，而杜全盤摹仿，囫圇吞棗之弊。

(2) 上列各部門，戰後應多派人員赴美研究或實習。

(3) 所派人員以嚴格而提高程度爲原則。大致應以在國內外大學畢業，或在各機關服務而成績優異，並經考驗合格者爲限。

(4) 上項派赴美國人員之實際工作爲高深學理之研究，或入工廠及其他機構之實習等。

(5) 宜由政府與美當局切實交涉，俾我所派人員，能實際加入上列各項機構，且得享受種種可能之便利。

(6) 上項人員回國服務，其待遇宜特從優。

(7) 採用美國機械材料，應限於絕對必要，而國內又無代替或有代替而不敷者。

(8) 認爲過度奢侈而無關於國計民生之事物，應防制其輸入。

(二) 我國勢應輸往美國之文化

至於我國輸往美國之文化，其勢自應限於偏於精神方面者，如哲學、文學、史學、藝術等。良以此項精神文化，我國有數千年之孕育發展，自有我之優點特徵，且可以調劑美國近代物質文化中機械生活之枯澀冷酷，使「物物而不物於物」（莊子語）。不過我固有之文化，應先予以改進，使其「盡善盡美」，「精益求精」，然後能爲美人接受。其如何改進，愚以爲應根據下列數端：

(1) 以中國固有良好之民族道德、品性及思想爲基本。

(2) 以真、善、美爲歸宿。

(3) 因時、地、人、物而制宜。

(4) 宜融匯貫通，使成一整個系統。

(5) 一方提高水準，一方求普遍化。

(6) 哲、文、史、藝應科學化。

(7) 以上各部門爲充實及改善內容起見，除派員赴美學習，考察研究外，並須派員赴英、法、德、意、日、蘇諸國，以分別吸收其特長。

再我國固有文化，已經逐漸衰落，至最近而極。同時因對外戰爭，屢次敗衄之餘，益以西方文化之侵入，使國人不覺失其自信力，甚至有視爲枯朽，毫無價值，而不惜全部摧毀之者。但由此次抗戰結果，足爲精神超越物質之鐵證。而此已經摧毀之殘餘文化，尙復能表現此偉大之勢力，是則我國固有文化，勿論對我對人，皆有復興之必要。爰就其優點、特徵暨如何改進以及與美人已往之關係各點分別略述如次：

(甲) 哲學 我國之文化，實脫胎於我國古代之哲學思想。一般以其爲偏於靜止、陰柔、保存、消極諸方面，而與美國文化所從出之歐洲文化相反。殊不知我國哲學思想中，老莊一派，固是偏於此方面。但數千年最佔重要之孔道，則主張中、庸、和、易諸原則。其條分縷析，固非此文所能盡。然就其大要言之，中者不偏之謂，無過不及之謂。此外「中」又訓正、訓平、訓均、訓適、訓心、訓精神等。足見其函義之廣博宏大。其次爲庸。庸者，程子云，「天下之定理」，又云，「不易之謂庸」。此外「庸」

又訓用、訓通、訓常。例如所謂五常之仁、義、禮、智、信是也。和者，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易云：「天下一致百慮，同歸殊塗。」百家融匯貫通，和之道也。「易」之理也；包羅尤爲宏富。大致爲：（1）簡易之易。易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2）變化之易。如易云：「生生之謂易。」又云：「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云：「日新之謂盛德。」書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莊子秋水云：「物之生也，若騾若弛，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此皆演進革新之精義也。（3）機。易云：「機者動之微。」又云「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云：「極深研幾。」又云：「知幾其神乎。」又云：「事機不密則害成。」蓋「機」者，由微之著，由幽之顯，故易道重之若此。而文中常見之機心、機事、機關、機樞、機要諸名詞，亦本乎此也。

總之，中國哲學對於培養道德，陶鑄品性，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等問題，尤爲深切注重。此爲我國哲學之中心思想一貫精神。亦即數千年來我國哲人所竭忠盡智之不斷努力，而所謂百年樹人，其工作之艱困可知。良以心靈內在之事，變化隱微，機妙難測，莫可名狀，不可方物。較之自然科學，有顯著之迹象可察，有條理法式可遵循者，其難

有加。但以其關於一民族之治亂興衰者至鉅。勢不能以其難而不更勉。彼美邦立國之道似過偏於法制。然法有時而窮。且「法愈嚴而弊愈深」，又爲一般之現象。重享樂則奸宄不得不滋彰，此皆物質文明極致之流弊，而以美國爲尤甚。此則我國哲人之思想言行，或可供美人借鏡之資。昔美國耶路大學校長赫德列（Hedley）氏曾云：美國學校課程中，甚缺少倫理道德之教材，深表遺憾。而美之賢哲如杜威、孟祿、哲姆士；英之羅素；法之柏格遜；俄之托爾斯泰；德之叔本華，皆盛贊我國哲學思想，良有以也。

（乙）文學 中國文學，有數千年之孕育發展，典雅富麗，洋洋大觀。吾人應引以自豪者。文學作品大致分詩、詞、歌、賦、散文、駢文。體格既多，其以相等字數綴成者，如詩之有三、四、五、六、七言，以及駢文之四六、排偶、整齊劃一，而抒情敘事，復流利自然，不受格律所拘牽，此則任何國文字之所不能，而爲我國所獨擅。偏重音韻，便於吟咏者，首推詩詞。而詩教最古，導源於三百篇。古代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皆可藉以窺其梗概。唐代集詩之大成，宋明而降，猶能衍其餘緒，另出別裁，亦復甚多佳構。此外散文駢文之富，似乎無盡寶藏。推而至於說部、戲曲、傳奇、筆記、小品，真是美不勝收。甚至說理之典籍，如經史百家，其文亦極粹美可觀。蓋古人類能虔守「修辭立其誠」，「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情欲信辭欲巧」諸原則故也。而近

年學者多以我國文字無文法不合論理爲詬病，殊不知古人「文成法立」，卽雖無文法，文理之清順者，自然合於文法。馬氏眉叔之文通，可供參考。又言理之精通者，雖無論理而自然合於論理。劉奇氏所作之論理古例，可資佐證。或又以爲我國文字之不適於科學，則請觀教育部已審定完成之物理、化學、機械、天文等科之名詞，則又更可表現我國文字之優點。蓋我國最常用之字，雖不過四五千，而字與字之聯綴成詞，產生孳乳，可至於無限，此又非任何其他各國文字之所能。且除複名之外，新創之單字，亦可無限。特已有之數千字，似已足用，其必須新創之字，自無多耳。

我國文學近年與美人更爲接近，其尤顯著者，莫如林語堂氏以英語譯作之「吾國與吾民」、「瞬息京華」、「生活之藝術」諸書，甚得美人之歡迎。然此不過林氏以輕鬆筆調及幽默情緒所出之說部小品文而已，不得卽謂之爲「大漢天聲」。而標準文學作品，又復不宜濫譯，蓋一經濫譯，其原有文學上之精彩喪失大半。例如近時國人譯西書，往往喜直譯，甚至逐字逐句，以及每句之結構，悉可與原文兩兩對勘。結果冗蔓拖沓，不堪卒讀，轉不如昔年嚴又陵、林琴南輩以粹美之國文，意譯歐美之名著，更覺親切有味。且其文學方面更勝原著。依同一原理，我國之四書、五經、老子、莊子、以及三國志演義、水滸、紅樓夢等書，雖久已用英文直譯，而英、美諸國人對之並不發生

如何之興趣，其理亦猶是也。故爲美人計，如欲研究我國文學，勢非先求精通我國文字不爲功。例如英國數大學，最近有籌設中國文字科目之議，此爲正當辦法，美人正可做效。特吾人對於吾國文字之更加研究，更加改善，先求國人更易了解運用，更加確切簡易，再進一步，使外人之習中國文者，更覺利便，此則人我共益之舉。愚以爲此項研究方法，仍不外以我國之六書，參以西文文法及論理，三路進攻，其效更大。

(丙) 歷史 一國之文化，可爲陶鑄一國歷史之質料，而一國之歷史，乃爲一國文化之反映。我國最古之史，莫如尚書、春秋。春秋而後，有斷代之二十四史，以及司馬光之資治通鑑。下至歷代野史，稗官小說，皆歷史也。至於劉知幾之史通，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則史學也。我國有五千年之歷史，宜其紀錄之豐富。在我固宜精研，而美人之欲悉我國文化者，自亦不得不予以探討也。

(丁) 藝術

(一) 音樂 書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云：「擊石附石，百獸率舞。」而論語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語，足見音感之深。我國古樂，本有匏、土、革、木、石、金及絲竹之八種，號曰八音。今多不傳。琴爲最精之古樂，然曲高和寡，難於通俗，且能者殆如鳳毛麟角。管樂之簫笛，較爲普遍。胡琴最流行，然已非中

國之本有。琴音最清純雅正，雖難而有復作之必要。大抵音樂一道，亦如其他學術，若能勤加探討，久之必能精嫻，寢假而與之俱化。粵之交響樂，雜入鋼琴提琴，尙屬悠揚可聽，惟似嫌纖弱哀思，宜劑之以激揚之音。總而言之，漢唐而降，我國已有禮壞樂崩之退步趨勢。民國革命，豐績偉業，遠邁前古，抗戰勝利而後，更宜制禮作樂，以宣揚大中華之武功文治矣。

(二) 戲劇附電影 年來美人對於中國戲劇，漸感興趣，其認識力亦漸有增加。戰後需要，勢必更有進境。我國戲劇，在美國之演出，大致可以分以下之數種：(1) 純粹中國戲如梅蘭芳戲團在美所演者，在美亦有相當成就。惟唱白均用國語，美之大衆不能聽懂，此爲最大障礙。其能了解者，勢只能限於表情、做工、服裝、佈景諸部分，即此數部分已足表現我國文化之特徵及優點。若能再用英語演出，當能更受美人之歡迎。不過此係遷就美人暫時權宜辦法。若美人欲了解我國戲劇之個中三昧，仍非觀聽用國語演唱之真正中國戲劇不爲功。此則又非先精通中國語文不可。至於我國戲劇本身，自有大加補充改良之餘地，而其最要之原則，在保存及發揮我民族之本質及光榮。若一味摹倣西洋，必難適宜。因摹倣未必精到，即令精到，則美人已飽飫，必不能討好，轉不如本來面目，在我縱爲平常，而在美人或爲新奇故也。至於劇本取材，則歷代說部、彈詞、

傳奇、以及流行之平劇，均可爲採擇之對象。又歷年抗戰，自多感天地而泣鬼神之偉績，尤爲絕好之資料。惟劇本之編訂，以及實際之演出，應多聘美國此道中高明爲顧問，以期合於美人之心理及習慣，此亦應注意之一點。(2)由美人自編自演之中國戲，如「East is West」一戲，在美國即繼續演至一年之久。惟美人編演我國戲劇自難免無牽強附會之處，我人理應予以糾正，並合作也。「王寶釧」一劇，美人極爲贊賞，關於此類之劇本，若由我國舊材料中發掘，所得想當不少。(3)歌劇，此劇有音樂歌唱而無科白，如我國之崑曲，此與Opera爲近。亦可在美一試。(4)雜劇，此爲短小精悍之戲劇，美謂之Vandeville。其中有歌唱、談諧、對白、蹈舞等等。猶之文學小品，以新穎而多變化爲貴。

電影爲傳播文化最經濟而易於普及之一種利器。美國年來電影界之最感困難者，是爲電影本事之採取，大有羅掘俱窮之概。故年來似頗移注其目光於我國之材料。如前數年「大地」之攝製，及最近國父孫中山先生事迹，方在攝製之中，皆其例證。而我後方現攝之「日本間諜」一片，將來必受美人之歡迎無疑。又近年抗戰，其可歌可泣之事迹，必可供電影之資料。此外我國民間故事，其清雅純正而適合美人之心理者，自當不在少數。惟本事之採取及穿插，暨演員佈景諸端，皆須十分考究，方能博得美人之好

評，以美爲電影事業先進國家，其品評必甚苛細也。

(三) 書法 書法爲我國六藝之一，而我國之字體，由籀、篆、隸、以至真、草行。其間經數千年之演變，燦然蔚爲大觀。不特供諸實用，而且能表現書家清高之品格與審美之情緒，此爲我國文化中最精彩之一部分。其中旨趣，奧妙無窮。就草書而言，如孫過庭書譜云：「觀垂針懸露之異，奔電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質，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峯之勢。或重若崩雲，或輕若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似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所能成。信所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中，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心不厭精，手不厭熟。規矩闡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可見我國書法之千變萬化，五光十色，非具有天才，而又久勤於觀摩者，不克臻此。我國其他之藝術，如音樂、繪畫、雕刻等，容未能於西洋並駕齊驅。但書法一項，爲我國數千年聰明才力之精髓，卻有獨到之處，宣揚之值。或者云，我國字體，與西人蟹行書大相懸絕，恐終非外人所能領悟。愚以爲此說未必盡然。因大凡天下之事，「難者不會，會者不難。」書法亦未始不如此。且中西人之聰明才力，相去並不甚遠，誠能善爲誘導，予以合理解析，未嘗不可

升入堂奧。若能先從有形質之規律入手，必能循序漸進。茲以楷書為例，其最顯著易解之處，可歸納之而得數端：（1）無論每字筆畫之如何繁簡，皆可容納於等大之格內，咸能佈勻洽，各得其所。（2）每字雖各個獨立，然能互相照應、聯絡、貫串。（3）每一字有一字之重心，故能安泰而無傾頽之勢。（4）用筆結體，純，青一色。譬如王羲之之書，無一字不王，無一筆不王，一目了然，如逢故舊。（5）用筆有圓有方，但圓中有方，方中有圓。（6）就精神而言，如顏真卿之小楷仙壇記卽「尺幅有尋丈之勢」。（7）就姿態而言，如王書之挺拔清秀，歐書之鋒銳勁健，顏書之豐腴安泰，趙書之柔媚活潑，蘇書之瀟灑飄逸，此其概要。吾人誠能著書立說，多舉實例，一面於國畫展覽中，多雜書法，以資美人之觀摩。強而聒之，積之以漸，其庶幾乎。

（四）繪畫 我國繪畫一道，以山水畫爲最高。而山水畫中，以士氣山水畫爲最高。良以畫家往往以其精神及懷抱寄託於畫中。雖不違反天然，但並不能純任天然，復能裁剪天然。而由其意匠經營之結果，復能創出一天然之新境界。使觀者神遊其中而不自覺。而山水畫既多出於文人之手筆，故繪畫每與文學打成一片。故王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摩詰實開我國士氣山水畫之先河。而我國鑑賞家之品藻山水畫之用語，如：「妙合天工，沈雄古逸，秀潤蒼渾，古雋超妙，秀雅絕倫，溫和恬靜，天真幽淡，蒼老

古樸，含蓄醞釀，娟妍工麗，雄厚豪放，幽閒凝靜，英姿卓犖，瀟灑出塵，鎔鑄毫端，淵雅靜穆，妙造自然，雄渾沖淡，胸襟高曠，不染纖塵」云云，業已美不勝收。足見山水畫之清高，甚合士人之興趣。同時復以其清高之作品，涵養觀衆清高之性情，此山水畫所以成爲士氣畫之中堅，而人物、花鳥、宮室之畫，雖如何之工細精美，其不能與士氣山水畫並駕齊驅，良有由矣。

我國士氣山水畫，導源唐之王摩詰，宋畫發展則曾登最高峯。然以時代久遠，真跡殊爲罕覯，元、明畫稍遜，清代三王（圓照、烟客、山谷），乃集山水畫之大成。近時名畫家輩出，如姜穎生、鄭午昌、陳樹人、張大千之作品，均屬個中翹楚，集古今於一堂。所謂有美皆備，無麗不臻矣。而外人對於國畫，年來探索尤勤，足徵漸能領其旨趣。國畫在歐美名都大邑之展覽會，時有發起，宣揚國光，誠爲盛況。爲精益求精，及對美人利便計，爰擬方案數則於下：

（1）山水士氣畫雖屬清高，然頗有「曲高和寡」之歎。爲啓發我國大衆，尤其美國大衆起見，仍應由用筆工細，色彩鮮明之山水人物宮室組合畫一類入手。默察此次陪都全國美術展覽會中中外觀衆之一般趨向，尤覺信而有徵。

（2）國畫應滲入西畫解剖、投影、透視、結構、配色等原理原則。

(3) 國畫分古人之畫、時人之畫兩種。時人之畫，可以隨時創作，自當力求精進。至古畫本屬有限，其精者尤難得。故價格昂貴，非一般好畫者之力能購置。在此情形之下，宜由現時畫家廣為臨摹古畫精品。雖不致毫髮畢肖，「可亂楮葉」，然以原本之佳，臨本終較庸手之創作為優，亦至足供玩賞。再就藝術之立場而言，唯美為本，固毋需斤斤計較古今真偽也。

(4) 裝璜方式，宜斟酌美國情況而定，大抵除冊頁外，中堂、屏、對、斗方、直條、橫推等，均宜罩以精美之鏡框，以便懸挂，且保護畫面，使能經久。鏡框除長方之外，小件畫可嵌入圓摺扇形、扇形，以及梅花、海棠、水仙、杏花、葵葉、桑葉、蕉葉、楓葉等形之鏡框中，頗為別緻。鏡框材料，宜紅木、烏木、柚木、核桃木、黃楊木。玻璃一項，最好用清爽之磋邊玻璃，使畫更為生色。又鏡框及畫，各應定互相配合之標準，俾同一鏡框，可隨時移換他畫，而嵌框之畫，又當厚裱，否則不平貼而易起壓褶痕。至上述冊頁一項，其面可利用倣宋錦，（因宋錦難得而價極昂，惟古畫則宜用，以其相稱。）以其花色多而古雅可愛也。

(5) 古今佳畫，宜以最精之珂珞版印刷，此則已不甚適於懸挂。其一般之用途，大致為書籍插圖、明信片、日歷、月份牌、信箋、封套、化妝品盒、糖果盒、廣告

等。

(五)雕刻 我國之雕刻，以金、石、玉、甲、骨類爲最早。金類雕刻，以鐘鼎爲最多。其刻文自成一類，謂之鐘鼎文。其字體娟秀勁挺，今日刻印章者猶喜用之。漢時銅印多刻小篆，刻文亦細緻。今日刻印章者，亦喜做用。石類雕刻，其刻文字者，如石經、石鼓文等，皆古石質雕刻之尙能保存而較完整者。晉漢而降，大書家如鍾、王，如歐、褚，如顏、柳之作，皆賴石刻而流傳。而敦煌之石壁畫及佛像最爲知名。佛像之多，可以千計，而其高大有至十餘丈。其刻工又復生動靈活，蔚爲藝苑奇觀。要爲我國文化之光。此外玉之雕刻中主要部分，蓋玉與我國文化關係甚深，古時天子以至庶人，皆佩玉。故玉比德君子，而孔子曾云：「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如玉之章章。詩云：吉人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筆者在美之圖書館曾見外人論玉及玉雕之專書不少，而美人亦多以玉雕爲陳設品者。故玉及玉雕在我國更有提倡之必要。愚以爲玉之雕刻宜就其色彩與天然物之近似者而摹擬之。如赤玉宜刻林檎、山楂、菱角、柿、金魚之類，碧玉宜刻瓜、豆莢、蘋果、以及青銅器如鐘、鼎、尊匱之類，黃玉宜刻栗實、杏實、香蕉之類。白玉宜刻象、羊、

貓、兔之類。青玉宜刻鯉魚、蟹、蟬、螭虎之類。紫玉宜刻萼薺、葡萄、菱角之類。骨甲雕刻，以殷代最盛，其文亦極古茂。此外他種雕刻，茲分別列舉如下：(1)象牙 上述玉類雕刻之物，均可用象牙。惟象牙之大有有限，故只能刻較小之件。此外以象牙刻印章極爲相宜。而印章之邊款宜刻鐘鼎文、瓦當文、古碑帖文，或帶寫意之山水、人物、花鳥、草蟲，均古雅別緻。惟均宜以粗筆深刻爲原則。使其印象顯著。一目了然。近日有刻蠅頭小楷者，稍遠視之，盡是線條。其更細者，雖近察之，亦不能辨。甚者非用展光鏡視之不可。此種辦法，謂之巧妙則可，實已不合藝術原則。以其近乎細而無當勞而無功故也。其刻筆纖細如毫髮之山水畫，近日最爲盛行。然亦費力而不討好。因其一觸目即覺係一幅印畫，已失雕刻之特徵及本旨。勿怪使人興致索然無味，此亦宜糾正之一端。(2)木類 木類如黃楊、紫檀、柚木、核桃均爲雕刻之好材料。黃楊宜雕小樹根座，或整列紙菸盒。盒面再淺刻字畫。或雕相框，或其他小件，如上述玉類雕刻之動植物等。紫檀宜雕瓶座、畫框、相框、大樹根座（江浙諸省，室內陳設多有之，此種圖案極古雅別緻。）以及床、榻、椅、桌等之裝飾部分。惟紫檀較罕而價較昂，故多以紅木代之。而我國紅木家俱，以其式樣優秀，雕刻精細，久爲美人所樂於購用。(3)玻璃 北平之料類雕刻，久已馳名。其所謂料者，實即土法所製之玻璃質。所雕之物，以烟壺

一項爲最普通。其套彩一種，卽雕刻之花紋，具二種以上之色彩，故最爲美觀。然雕工較難，而價格亦較昂。除烟壺外，可雕之物亦正多，如花瓶、杯、盤均無不可。愚以爲乳白之毛玻璃片（光玻璃有浮光損目力）類乎宣紙，淺刻文字圖畫，以精緻木框裝之，懸挂壁端，或陳設案上之小屏風，一如書畫之裝璜格式。文字宜填黑色，俾黑白分明，方能爽目。畫則酌填色彩，必絢爛可觀。（4）瑪瑙 其適宜雕刻之物可依玉類之例。（5）竹 竹類以刻扇骨爲最適宜，其刻筆筒鎮紙亦普通。

（六）建築 我國建築之特徵優點，有如下之數端：（1）歐美建築，大致以統屬於一個單位爲原則。我國建築以若干個別單位互相配合聯繫而成一個系統爲原則。（2）個別單位，各具特殊格式，如殿、閣、樓、臺、亭、塔之類，而以廊榭聯繫之。（3）建築應與環境如山水林木或他建築互相和諧照應。（4）色彩之調和，如屋頂之用赤色棕色，使與青山綠林碧泉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若屋頂改用綠色，反覺單調，而與環境相吞沒。（5）大之則宮殿廟堂，小之則室廬宇舍，各盡其妙，各得其所。總之我國今後之建築，除實用建築，如銀行、商店、辦公處三類，在必要時，純採西式外，有關文化之建築，如國會議堂、學校、陳列館、圖書館、劇院、花園、住宅以及野外風景區之建築，以盡量採用中式建築圖案爲主要，而其中之光熱設備、衛生設備，以採用美

國最新者爲依歸。實際上年來我國建築，大致多依上述各節而設計。不過有取半中半西之方式者，如北平之燕京大學、協和醫院等，實則不中不西，兩失其美。至於首都之陵園、上海市政府、廣州中山大學等，則純取中式，便洽合我國人原來興趣觀感，而在外人心目中，則新中有舊，舊中有新也。又我國建築圖案，若由宋、明畫中求之，多有輝煌燦爛之佳構，遠非現時已成建築之所能及。

各種優美建築之小模型，可配之於盆景之中，或單獨陳設。其照片或印刷之畫片，可適用於日曆、月份牌等。

關於室內陳設，則上述之書、畫、雕刻，以及下述之花果暨美術器物，皆其個別單位。如何使此個別單位，各適其適，各盡其美，各得其所，而又能互相和諧，互相關照，此在乎陳設者之匠心與趣味矣。

(七) 帶美術性之器物

(1) 陶瓷器 我國陶瓷器，世界知名，無庸贅述。明代古瓷，已極優美。前清康、雍、乾、嘉各朝，可謂登峯造極。嗣後逐漸退衰。但古瓷雖佳，然數量有限，不足以資流傳，勢非新製不可。而新製粗劣，遠不及古。故戰後獎勵瓷業，使復昔日舊觀，已能在世界上放一異彩。我國瓷器，大致可分單色與繪畫二種。單色尤覺大方樸素，其

色繁多。舉其較著者，有棗皮紅、豇豆紅、雞紅、丹砂紅、粉紅、寶石紅、金魚紅、瓜皮綠、蘋果綠、松綠、鸚哥綠、葡萄紫、茄皮紫、魚膽青、雨過天青、秋葵黃、栗肉黃、鱈魚黃、月白、雪白、羊脂白、乳白、糙米白、葱白等等。其他不能悉數。其繪畫者，亦有單彩與套彩之分。所用之彩，有軟彩硬彩之分。軟彩易畫，但亦易磨脫。硬彩難畫，但能耐久。而瓷上之畫，係用釉料畫成。畫者須有特別技術，非一般畫者所能辦。其能畫盜者並不多，而高手更罕觀。此種人才在瓷業中非常重要，非用重資多多造就不可。能畫盜是一事，應以何種圖案畫於瓷面方能適宜，美觀，另是一事。二者有密切之關係，相需為用。其圖案一項，亦大有研究。我國瓷料之佳，固無問題。問題係在圖案與畫者之技巧而已。誠能兩者並皆佳妙，則盡善矣。銷美瓷器，宜並注意餐具一項，因銷量較陳設瓷器為多也。

(2) 青銅器 我國古青銅器，如鐘、鼎、盤、卣、匜、尊之類。在殷、周時特別發達。其形式之完整，花紋之工緻，四五千年前已能臻此，極可寶貴，西人亦歎為觀止。不過古物極有限，宜多多做製，以廣流傳而資觀摩。

(3) 漆器 福建漆器向稱我國漆器最佳之品。不過其式樣花紋，大都出工匠之手，拙劣俗陋，大有改良之餘地。

(4) 木器 其藝術部分，在上述木雕刻已略論及，茲不贅。

(5) 竹器 筆筒、鎮紙、扇骨、花籃、我國向以竹製之，甚屬相宜，加以刻字刻花，更爲雅緻。

(6) 香茗 香指所焚之香，由香而及香爐。亦猶品茗而涉及杯壺。香茗及其用具，皆美人所愛好，而以爲深具中國臭味之品。

(7) 編織品 織品以宋錦之花樣爲最絢爛繁縟。小之宜裱畫冊之面，大之則蒙古式沙法，亦並無不宜。惟宋錦極昂而難致，故在勢不能不用做宋錦。編品則平津之毛毯，其圖案之古樸大方，色彩之鮮明，久爲美人所愛好，在我則應精益求精。

(8) 針黹品 針黹品包括甚多，如刺繡、刻絲、縵絲、挑花、抽紗等品。此類美術性之手工品，亦至爲美人所歡迎。美國關稅對於是項物品雖苛細，但由華輸美每年仍值鉅萬。按美國此項關稅政策，對於美方並無利，而於我方則有害。因在美方關稅雖高，並不能遏止其進口，一也；美國人工貴，且根本不適亦不願從事此項繁細手工業，故對於保護勞工利益，並不生影響，二也。在我方則因輸出較少。致不能養活更多之工人，此於我不利之點。其他各項美術手工品，其情形大都與此相同。美國此項關稅政策，戰後有商請其變更之必要。

(9) 衣飾 美國婦女，頗喜我國衣著，而以刺繡者爲尤甚。此不特出於好奇心，亦良由我國婦女衣著，其色彩花紋以及剪裁形式，各具匠心，而饒有藝術旨趣。又衣著一項，與戲劇電影皆有密切之關係。因演一時代之故事，其衣著必須與該時代適合，且須藝術化也。至於飾具，則我國經數千年之發展，其優美式樣甚多，大可根據已有式樣，再行推陳出新。以適於現代之需要。惟言及衣飾，勢又不得不涉及理髮形式。蓋髮型須與衣飾相照應，且爲裝飾中最要之一部分也。我國古時髮型頗多優美可觀者，現時在日本尙流傳其大概。前清以至民國二十年前後之髮型，雖與古妝不同，但精巧者亦復不少。近十年來燙髮風靡全國，此項燙髮，其奢糜姑不具論。卽就藝術立場言，其蓬亂鬚曲，有何美感之可言。又何必一味盲從也。

(10) 食品 論語稱孔子食不厭精，清代袁子才有食譜之作，膾炙人口。而時人林語堂，在其「生活之藝術」中，盛稱我國食品之配合適當，風味特多。惟西洋美學專家，向不列烹飪一道，以爲口舌之興味低級。殊不知西方調味本來較爲單純淡泊，其不能列於藝林亦固其所。就中法國烹飪則較精細複雜，故老饕不得不錫以 *Culinary Art* 之嘉名。我國食事則變化多方，清腴適宜，有美不勝收之概。故西人對於我國藝術容有未蒙嘉許者，但對於我國餽饌，獨不覺努力加餐。美國通都大邑，我國食館特多，尤爲

明證。此在我則對於烹調之術，宜再求精進，同時並須補充及改良者數項：（1）厲行分食法。（2）食時佐以花卉音樂，以助清興。（3）廚房設備，宜盡量採用美式，以期衛生清潔。（4）應適合營養之科學原理。（5）外交上聯歡以及旅宿遊樂場所中餐爲主要供應，果能如此，則止於至善。

（八）園藝

（1）花草果木 我國之花草果木，既富裝飾陳設之性，復有品質之可言。如牡丹、芍藥、海棠、碧桃，則以艷麗勝。蘭、桂、梅、菊、水仙、茉莉、菖蒲、佛手，則以馥郁勝。松、竹、蓮、天竹、天冬草、鐵線草，以清雅勝。柑、橙、葡萄、石榴，以甘旨勝。而牡丹、芍藥、菊之類，早已盛植美邦，久得美人之贊賞。而花草果木，在藝術上之處理，略可得下列之數端：（1）插瓶之花、果、草、木須予剪裁，使具更美之姿勢。（按帶枝葉之果，以及松竹，並天冬草、鐵線草，皆可插瓶，且甚美觀。惟蘭及菖蒲只能盆栽。）（2）插瓶之色料形式，須求其精美而藝術化，俾與所插之物和諧，而相得益彰。（3）盆栽花草果木，宜配以適當精美之山、石、亭、臺、屋、宇、橋、欄、人、物、禽、鳥等，使相映成趣。（4）善於組合，如松、竹、梅謂之歲寒三友是。（5）果類如佛手、香櫞、石榴、葡萄、橙、柑、香蕉，或單獨，或組合，陳精盜盤中，

托以盤座，亦富於陳設性。且可列入畫材。(6)盆景以山石爲主體者，可通自來水管，以假造瀑布、噴泉、碾房之類，俾靜中有動。

(2)禽魚 園中宜蓄禽魚，俾生趣盎然。禽如孔雀、白鶴、鸚鵡、百靈之類。魚中之金魚，固中外共賞者。

(3)園景佈置 園景佈置，則以亭、臺、樓、閣、廊、榭、泉、石、橋、徑、草、木、鳥、獸等所組合而成之有系統之整個體，其計劃較之陳設一室更爲複雜而擴大，然各部分之宜互相適應和諧，則初無二致。美國園景佈置 *Landscape-gardening* 大都以整齊劃一爲原則。此係另成一格。但我國則重幽深曲折，因地制宜，其處理自較不易。

(九)野外風景區之建設 野外風景區之建設，自應擇崇山峻嶺，及邱壑林泉幽深茂密處爲之。並須配以雄壯瑰偉之建築，俾天然與藝術之融化渾成。此則頗費意匠經營。但由宋、明山水畫中求之，當得資助不少。我國文字描寫宮室山林之美，茲節錄數則，以見一斑：

此處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王羲之蘭亭序

潦水淨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崗巒之體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觀飛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左思蜀都賦

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噶噶。雙闕雲疏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孫興公天台賦

仰視則迢遞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玉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吳均與顧璋書

石泉漱瓊瑤，織鱗亦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

巖峭嶺重巒，洲縈渚連縣。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澗。謝靈運

野棠開未發，山櫻開欲然。沈修

煙波蕩漾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白居易

筆者書至此，對於上列各條尙有管見數端，茲特概括補充如下：

(1) 我國文化之內容及性質，不特美人多隔膜，即國人（尤其現代青年）亦多不甚了了。後者尤爲可悲現象，亦屬不合理現象。爰特加說明如上。

(2) 爲求中美人士對於我國文化更能認清了解，更形習慣與愛護起見，宜從宣傳入手。宣傳之中，包括教育、刊物、展覽、指導、游歷等。

(3) 戰後美方物質文化，必如排山倒海之勢，輸入我國。而我必謀所以交換，其最適於交換者莫如上述之我國文化事業。因其有下列之優點及特徵：(A) 國人性質習慣，較美人更適於上述各項偏於精神或手工之事業。(B) 我國人口較美爲衆，生活程度較低，此亦爲較適於上列各項事業之條件。(C) 我國之機械出品難與美國競，亦不願與美國競，以免發生經濟上衝突。若以上述性質不同之事物懋遷有無，則各適其適，各得其所。(D) 上述各項文化事業，需物資極微，如音樂繪畫之類；或需物資較多，如風景區之建設及戲劇等，但皆可就地取材，且幾於不須機械設備，又不似工業需維持、折舊費之鉅，及需原料之常川供應。(E) 我國全部文化事業，若能充分動員人才物力，使臻盡善盡美，則除對美發展外，同時復可對我及美以外其他各國。其於宣揚國光爲效當必弘大而普遍。即專就經濟上之收益而言，其利之鉅，當亦可想而知。

(4) 關於美術手工品一項，似應注意下列二點：(A) 宜以花色繁多及圖案新穎爲原則，俾美方便於採用，同時可藉以窺察其嗜好及趨向而投合之。(B) 爲求普遍起見，宜多分等級，以供各方之需要而適其購買力。

促進戰後中美兩國文化關係之機構

- (一) 擴充中美文化協會，在中美各大都市增設分會，爲介紹、聯絡、推進兩國文化及國民友誼機關。其下可設宿舍部、俱樂部、舉行同樂會，組織遊歷團等。
- (二) 在美設中國文化學院，或在美各大學增設中國文化講座，並交換師資。
- (三) 在國內設中國文化研究院，以備中美學者深造及交換智識。
- (四) 在教育部下設「文化宣傳委員會」，主辦國內外展覽、戲劇、電影及出版事業，並加強「國立編譯館」工作。
- (五) 在經濟部下設「工藝局」，主管中國美術手工藝品之改良及採購、銷運等事項。

- (六) 全國風景區之建設，由內政部統籌辦理。
- (七) 園藝之改良及發展由農林部統籌辦理。

結 論

綜以上各節，筆者深以爲偏於物質方面之文化，我國向來落後，戰後建設，尤希美

邦之援助。至偏於精神方面之文化，我國容有一日之長，深願貢獻於美邦。且中美邦交素篤，最近中美新約之成立，尤爲兩國親善之明證。戰後兩國文化關係，若能愈加密切，互相融洽，截長補短，通力合作，以產生一中和完滿之新文化，是不特兩國之幸，抑亦世界和平之光，筆者馨香祝禱之矣。

戰後中美文化關係論叢

戰後中美文化之關係

袁同禮

一 序 論

甲、中美文化之同異 文化者，小而衣食住行之各項物質運用，大而典章文物之一切社會組織，胥在其中，而一般文化之表現於政治經濟之大部門者，尤為顯著。政治經濟亦不外於社會組織之一種現象，而政治經濟之組織，仍有賴於社會人民團體為之推動。美國立國以來，其政治一本之於社會與教育，以教育改進社會，仍以社會推動政治經濟，故本文探討中美文化，分為政治經濟社會三章，三者互相為用而合成文化之全體

欲探討中美未來之關係，應根據既往歷史及現在事實以為探討之資料。由以往之地理歷史及今後之趨勢，以研討中美二國之文化關係，即可發見其立國情況，有若干同點異點，而且大同之中有其小異，小異之中又有大同。請略為分述如下：

1. 就地理位置言之 中國在舊大陸之東偏，而美國在新大陸之北部，美國介於太平

洋大西洋之間，又握有巴拿馬運河，以綰新舊兩世界之交通；中國則在歷史上，久矣綰有東亞南洋之海上交通，以及由中亞西達東歐之陸路交通；其在太平洋方面，則與美國有共同之利害。

2. 就地理形勢言之，中美二國，同爲地大物博，兼有溫帶寒帶之氣候，其東部南部，具有大川大湖，以供交通工具，農工業之發展較速，而西北部地勢高曠，產業發展較遲，此點亦略相同。但美國富有平原沃壤，交通更爲便利，各區經濟發展，時代雖有先後，但既經歷年改進之後，程度已不甚相遠，而中國則山脈歧出，頗多不毛之地，因此國內各部分，陷於貧富不均，文化懸殊，而政治亦不免於複雜，一切調整改進，尙待今後之努力。

3. 就內部歷史言之，中國已有數千年之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幾度發展後，旋又中經停頓衰落，而美國爲十八世紀以來之新興國家，超然局外，逐步邁進。中國受數千年專制之桎梏，近年始趨向於民主政治，美國則自開國以來，卽已尊重自由主義，以爲世界之先導。美國自始卽未發生社會階級，而中國若干人民，迄今尙在憧憬於封建思想，而爲建國之障礙。美國產業發達，久矣握有世界金融世界貿易世界交通之權，中國雖富有資源，而一切尙待開發。美國國民教育業已普及，而中國尙待努力促進。

4. 就國際關係言之 美國之政治經濟文化，久矣為美洲之中心，正無異於中國既往之為東方文化之中心。經過此次大戰之後，其國際地位，更由新大陸領袖，進而為全世界領袖，中國對於現代之大世界認識較遲，然在東方既往之小世界中，具有悠久之歷史關係，迄於晚近，仍未斷絕；而且抗戰六年，獨力撐持東亞南洋之危局，直接間接，為同盟國家之屏蔽緩衝，最近更與各大國並肩作戰，為反侵略之一主要力量。

5. 就民族組織言之 中國民族以蒙古種系為主，而美國以條頓種系為主，其糅合各小族而建立一大國家，似乎相同；而其糅合之方法則迥異。中華民族之構成，大都因仍自然的種種結果。積年累月，逐步融合，而團結堅凝之工作，仍欠堅強；美國之移民入籍，多出於個人之行動，與三苗匈奴氐羌鮮卑吐蕃南詔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攜族以歸化於中原者不同。且美國之入籍移民，大都屬於較有思想曾受教育之分子，故一經美國政治訓練之後，易於融合而成為一新民族，與我國之只求消極的相安者，又自不同。

6. 就民族思想言之 我國人之尙服從，與美國人之重自由者，思想大異，但好和平厭戰爭之心理則同。總裁曾云：「三民主義以人類大同世界和平為最後之目標」，此項旨趣，雖光大於現代，實孕育於先民。中國先民哲理，向來主張以己度人，由「親睦九族」「平章百姓」以推及於「協和萬邦」，我先民固然主張「以夏變夷」，然春秋對

於適用夏禮之夷族，恆予以夏人之同式待遇，可知「以夏變夷」之本旨，在於提高四鄰異族之文化。歷代對於來歸化之異族，固矣與本族並無歧視，即對於附庸之外國，亦曲盡保護之能事，而絲毫無所苛求，其態度之光明，正無異於美國之於菲律賓。一八三一年之波士頓自由報（Liberator）有「吾國即世界國人即全人類」之格言，正與我國「四海兄弟」之旨符合。數千年來，東亞南洋以及中亞國家民族，頻仰中國之保護，並接受中國之文化，即此可以證明古人之「以夏變夷」實屬有其必要。而且當其實施之際，多出之於善意之引導，而不含有菲薄異族文化或消滅異族歷史之惡意，與彼好戰嗜殺之國家，冒共榮之名以行獨吞之實者，正屬相反。中華民族之和平自由思想，雖嘗為後來之專制政體所遮蔽束縛，然歷代專制政府所管轄之範圍，至為狹隘，雖在秦漢以後，中央政權大為擴張，實際亦只操有軍事權、司法權、外交權，以及有限制之賦稅權（田賦為主）。至於考試權，漢魏命官以徵辟選舉為主，郡縣地方之行政用人，且恆視當地輿論以為從違進退，其在下級地方區域，更仰鄉官為治。漢朝雖無現代自治團體之組織，而士紳頗能發揮現代第四階級之力量，迄於隋唐，鄉官制度全廢，而後科舉盛行，考試銓敍之權，始盡屬於中央。此外則僅有鑄幣權（發鈔權除宋元明之官鈔外仍屬人民）及一部份專賣權（例如歷代之鹽法明之茶馬）工程權（海塘河工）通郵權（驛傳為官而設然

郵信仍屬人民私營)而已。其他關於內政部份之教育事業(書院義塾)，生產事業(農田水利)，社會救濟事業(社倉積穀善堂救荒救火會施醫所)，交通事業(義渡村道航船鑿局)，警察事業(鄉團商團漁團)，以及社會組織(宗祠會館公所以及商工業之行幫)等項，大都予地方以自由，予人民以自由，此類事業之興廢成敗，純視地方官紳之提倡，與地方人民之意志，以爲消長，而中央政府並不加以干涉，故雖專制數千年，而除卻若干之暴君污吏天災外患而外，仍得苟安一時。但雖富有愛好和平之思想，而缺乏擁護和平之勇氣，此則與美國人民最喜仗義執言者，大有不同耳。

乙、中美文化之溝通與太平洋之將來 欲謀太平洋之安全，首須認識幾個要點，即：(1)太平洋之禍根，恆起於西北部之東亞南洋；(2)東亞南洋諸國之強弱，太失均衡，以致侵略首禍之日本，得有併吞近鄰急速發展之機會，而且利用其併吞所得之資力，以從事於次一度更擴大之戰爭；(3)東亞南洋若干國家之積弱，固由於自身之關係，亦兼受西方殖民政策之影響；(4)在東亞南洋諸國之中，惟有中國足以抵制日本，爲東亞，爲太平洋，肩任此第一道防線之職務，抗戰六年之事實，可爲證明；(5)中國數千年來，久矣爲東亞南洋諸邦諸族之文化中心，即日本之勃興，亦頗得力於中國之文化，不過彼所竊取之中國文化，業經惡用之而化爲侵略之一種武器；(6)

中國之國境安危，古代側重西北，而近代側重東南，而且中國與世界交通，必須假道於太平洋，因此中國之安全，與太平洋之安全，有密切不可離之關係，而增強中國之實力，亦即所以鞏固太平洋之和平；（7）美國之政治經濟種種關係，雖不限於太平洋，然而今後在太平洋上之發展，比諸大西洋方面，或者更爲重要，即在此次戰事之中美國所受之危險禍害，亦係直接來自日本，而德義之攻襲美國，尙屬間接的；（8）自海約翰氏門戶開放政策發表以來，美國對遠東之關係，雖因日本之阻撓破壞而不獲遂其夙懷，然其屢次仗義執言，明中暗中，已奏不涉之效果，尤其扶植菲律賓濱之自治自立，其所以感召東亞諸邦諸族之興奮者，更爲重大。

由乙項各點觀之，可知今後欲保證東亞南洋之和平，首須完成中國之建國大業，俾中國不僅於抗戰期間，獲與英美蘇三大國並肩作戰，爲東亞戰場之中心柱石，而且戰後，仍將繼續努力，爲太平洋西部和平之中心柱石。其次，則須改善殖民政制下之各邦各族，解放其固有之束縛，而提高其自治自主之能力，使東方禍首失其可侵略之目標；同時，且須改善日本若干年來野蠻慘酷之殺人教育，而恢復其人類本具之同情心，以共趨於人類大同世界和平之境界。惟上述事項之推行，必須中國強盛，乃足以制止其他之東亞國家，不敢妄啓侵略之野心；亦惟有中國強盛，乃有以扶助其他之東亞國家，得以

邁進於自立之途徑。更由甲項所列各點觀之，可知中國之立國要素，多與美國小異而大同，尤其在太平洋上有共同之利害關係，而其東西遙遙相對，又同爲太平洋和平之二本柱石。中美二國，同屬地大物博人衆，有協助鄰邦之能力，而無侵略鄰邦之需要，故今後欲謀太平洋之安全，先須努力於中美文化之溝通，使之愈益密切，以爲太平洋後進國家之先導。中國今後必須步美國之後塵，推行民主政治，且須與美國合作，以建設新邦基礎，實已毫無疑義。所要探討者，乃在如何推行之計劃方案，請就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分節論之。

二 政治方面之中美聯繫

先進國家之政治可資中國之借鏡者，當然不止美國，美國之政治制度，亦不必盡合於中國國情，但中國今後如欲博采各先進國家政治制度之所長，以供我國之仿行，自以美國爲最多而最宜。其故有五：

(1) 美國爲民主國家之先進，其憲法之精髓要義，久矣爲各國所採用，我國父之創建三民主義，亦嘗以民治民有民享之精神爲參考；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四種政權，在美國之各邦各城市，多已行之有素；而五權憲法之制度，又係採取三權鼎立之綱領，

而復增益以我國固有之監察制度考試制度，以參合而爲用。我國古代之司法事務，雖嘗混合於行政之中，但歷代對於司法事項，莫不特別鄭重其事，向來兼掌司法之行政官，必須熟悉律例，否則必須聘有刑名專家之幕僚爲之襄理。

(2) 歐洲國家，除蘇聯外，大都屬於狹土寡民，與廣土衆民之治有殊，惟美國亦爲廣土衆民，情勢與中國爲近，故其政治制度，可以供中國參考效法者，自較他國爲多。中國當然不能採取其聯邦制，以妨礙中央之統一，然必以地方自治爲民國憲政之基礎，國父早已言之更無疑義，是蓋有鑒於美國而然。

(3) 美國向無侵略之野心，更無在世界任何地點建立帝國之企圖，且其遠東政策，始終以善意協助我國。自一八九九年海約翰氏通牒發表以後，美國始終以維持在華之國際均勢，爲穩定中國地位及東亞政局之計，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中之表示同情；華府會議之成立九國公約；九一八以後對於日本之一再警告，且宣布始終不承認之決心；最近又偕英國，同時與我國訂立新約，取消不平等之舊約條款；凡此種種，皆於有形無形之中，大有造於中國。方今有識之美國人士，大都承認中美合作爲太平洋和平之唯一條件，雖猶有見識淺陋而故爲標新立異者，倡爲東亞均勢等等不合事實不切利害之謬論，實爲明達之所不取，美國幸福雜誌 (Fortune) 之備忘錄，久矣辭而闕之，且明

言須有「不均勢」之強大中國，乃足以支持東亞之和平，所見正與吾人相合。中國自信無侵略他國之野心，久爲美人所樂道，今後兩國政治上得密切合作，實爲中國增加一種極大之力量。

(4) 美國多年以來，非不注目於太平洋，但終不若大西洋之重視，因此，日本得以乘間發展，終不免有珍珠港之襲擊。大西洋上，尙有英國爲美國之屏蔽，美國之敵人，不能一躍而進攻西印度羣島，此與日本之得以逕襲夏威夷者不同。惟有中國強盛，與美國相呼應，乃足以制止日本之野心，保障東亞南洋之和平，亦卽爲東太平洋南太平洋之屏蔽，故今後美國爲自身利害計，爲世界和平計，均應扶助中國，以抵抗日本之侵略，其國策應漸趨重於太平洋，尤應趨重於東亞南洋。

(5) 戰事結束以後，應更加強戰時同盟之聯繫，以保未來之集體安全，此爲衆所共喻。在此世界全體利害密切聯繫之中，又有其各個區域之局部利害特殊關係，故幸福雜誌之備忘錄中有太平洋委員會一項，而王寵惠博士亦嘗提議在集體安全全體組織之下，更分別成立區域之集體組織，而太平洋卽爲其中之一。中國之爲東亞南洋諸邦諸族之文化政治中心，已有二千年之歷史，近百年來，雖經中落，然其若斷若續之歷史關係，及地理位置之接近密切，概有不可磨滅之事實存在其間；美國則事實上旣已取有世

界的領袖國家之地位，其為太平洋國家之一領袖，更屬毫無疑義，故太平洋之集體安全組織，端賴中美二國為之領導。

由上所述，可知中美之政治合作，不僅有其可能，而且有其必要，但迄於現在為止，中美政治合作之實際程度，距離其事實所必需者，相去尚屬遙遠，作者以為欲謀政治方面之中美聯繫，必須循行下列三種途徑。即：

(A) 政制思想之溝通 二十餘年前，北平有志人士聯合英美學者合組政治學會，除舉行學術講演，及編印英文季刊外，並設一專門圖書館，搜集政治經濟及國際關係之資料，在國際上頗佔有相當地位。茲擬鄭重建議，仿北平政治學會之先例，由中美二國之政治學者，合組一中美政治學會，專門研討中國憲政，及中美政治合作之問題，將上述二大綱，分成若干細目，指定專家，分別研討，以供兩國政府採擇；政府如有顧問或委辦事項，亦可接受；同時，利用繙譯、著述、廣播、游歷等等交換方式，使雙方之政治學者，更多交換意見與互相參考之機會

(B) 政治合作之組織 中美既有共同作戰之聯絡，將來收復區域之善後復員問題，似亦須與軍事動作互相銜接，凡屬收復之區，隨即交付於善後之行政機關，編製警保，招撫流亡，整理交通，恢復生產，以與軍事之肅清工作，互相聯絡，乘此兵燹之機

會，革故鼎新，較易進行，此項善後人員，尤須早爲訓練準備。昔我國經太平軍軍事之後，若干地方痛遭破壞，正有同於美國南北戰爭以後之南部諸邦，然而美國乘此改革，以立後來之基礎，而我則因仍舊貫，失卻良機，卽此一端，可知美國政治歷史可供我國師資參考者，正自不少。今後收復地方之善後事業，千端萬緒，若干地方並可利用美籍之教會學校醫院等項團體，使有參加之機會，以協助處理之。

(C) 善後財政之調劑 戰後復員，需款浩繁，淪陷區域之救濟事業，尤屬不貲，此等區域，不僅戶口流亡，室廬焚毀，而且溝壑縱橫，邱原隴畝均已失卻原形，今後亟應遵照新建設之計劃，加以通盤整理，此項新建設之財政，爲量既巨，需要孔亟，不得不仰給於外債。環顧友邦，大都創巨痛深，亟謀自善其後，其負有餘力而堪以接濟友邦者，美國而外，恐正不可多得。且此項建設經費，以設備器材爲支出大宗，公債舉之於美，支出仍用之於美，於美國亦大有裨益，但我方須有完善計劃，以立建設事業之確實基礎。上述之復員善後，以及新建設之計劃，似可聘請美籍顧問從旁協助其事；同時，於財政部中組織一財政委員會，聘請美國之財政專家，金融代表，共同研討，以爲籌借稽核之總機關。美國之國際財政專家如道威斯楊格之流，於上次歐戰之善後財政計劃，貢獻甚多，各國之財政恢復，亦頗得其力，先例具存，要在如何運用耳。

三 經濟方面之中美聯繫

中美二國經濟事項之有待於聯繫，比諸政治更爲重要，亦更爲廣汎，雖則近百年來，中美兩國間之貿易金融航業等項，並未十分發展，但經過此次戰事之後，世界各國之組織地位，以及國際關係，當然有一番變動，而中美之關係，較諸戰時更須加強加密，經濟方面，尤爲特然。茲請從各方面分端研討之：

(1) 貿易 中美間之出入口貿易，初極微弱，進步亦甚迂緩，中國入口貨中之美國物品，雖偶佔第一位，(例如一九三二年之入口美貨佔入口總額百分之二五·八)然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或以後之若干年，依然讓英日佔首位。且因我國貿易數量微薄之故，在我國視若龐大之數字，而在他國之百分比中，卻極渺小。是皆由於我國之生產事業過於幼稚，無大量及特殊之商品，可以供美國之需求，因此又缺乏購買力量，遂使中美貿易無由發展。今後中國，必須改進農業，以促進工業，亦必須振興工業以幫助農業，而增加其國際貿易額。而且美國之國際供求，今後將隨戰爭與政治之種種關係，而有重大之變動，此爲衆所共見。美國之國際貿易，向以歐洲及拉丁美洲爲主，今後一方由於歐美二洲之各國生產進步，所仰給於美國之製成品，逐漸減退，而原料之競爭愈以加強，故

美國勢必爲此一部之剩餘物品另求銷路，且須爲此一部分共競而難得之原料另覓供給。上述二項問題，中國可以幫助美國解決其一大部分。同時又因國際政治種種關係，美國之貿易，必須向西太平洋發展，更無疑義。或謂中國工業振興以後，所仰給於美國之物品，勢必日減，殊不知中國工業之發展，並非短期間所能一躍而及，在此期間，縱或入口之製成品逐步漸減，然亦有一定之境界，其中又有若干特產特需之物，如火油、鋼鐵、機械，以及工業高度化之製成品，方將隨工業之進步及購買力之強盛而反見增加。且中美友誼日益密切，金融航業保險倉庫各項設備，愈臻完善，勢必使美貨之在華銷路更佔優勝。至於中國供給美國之出口物品，一俟農業改進工業擴充之後，不僅絲綢、皮革、豬鬃、大豆、桐油、藥材、鑛砂等項之質與量當有進步，而且應於對方之新需要，我方必將予以新供給。

(2) 金融 美國在中國之金融事業，近年始漸有發展，但其基礎並未置於商業貿易之上，而側重於財政，其在戰前，美國除與我國訂立棉麥借款外，並向中國收購白銀，以經濟協助中國，其在戰後，又嘗一再借款，即：

第一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由出入口銀行貸款美金二千五百萬元

以華產桐油售抵

一九三九年三月

飛機公司借款一千五百架一千二百八十萬

第二次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

信用貸款美金二千萬元

以華產之錫售抵

第三次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用貸款美金二千五百萬元

以華產之錫售抵

第四次

(正當汪精衛與日本訂約之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美財政部信用貸款美金五千萬元

以穩定中國幣制

又

華府建設銀公司貸款美金五千萬元

以供中國政府抗
建之用

第五次

建設銀公司與出入口銀行共同設立金屬
準備公司，開辦美金六千萬

專購華產錫錳

第六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

美金五萬萬元

以援助中國之戰
時財政經濟

以上貸款，均以扶助我國之財政金融為目標，第六次之貸款，不僅數量頗巨，而且富有意義，即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共同發表宣言，關於五萬萬元之經濟援助借款，正式成立協定。其要旨有七：
(一) 穩定中國幣制銀行及經濟系統；(二) 促進生產之增加，以取得及分配所必需之物資；(三) 阻止物價上漲，防止通貨膨脹，並促進經濟關係之穩定；(四) 防止食糧及其他物資之屯積；(五) 改進運輸及交通；(六) 實行社會及經濟各方案以促進中國人民之幸福；(七) 供給在租借法外之軍事需要。戰後中國之金融事業，仍當依照上開要旨，努力實行，故今後必須加強中央外匯實業農民土地數大銀行之組織，以鞏固金融機

關之中心；整理戰後之平時幣制，及外匯聯繫之平衡方策，以穩定國際之貸借關係；整理中央及各省地方之內外公債；以增高國家之信用；防止社會階層之互相欺壓，互相剝削，以維持經濟上之平等自由。

(3) 工業 無工業則農業不能進步，商業亦不能進步，且使國防工業等等，概無基礎可言。故中國今後必須奠國基於工業之上，此為有目所共睹，以中國之資源豐富，雖視美國蘇聯為遜，而比諸其他各國則為優裕，然而我國之工業落伍，尙遠不及歐洲資源貧乏之諸國，其病根實以缺乏技能為主，而缺乏資本尙在其次。故振興工業，當以養成工業專門領袖人才，及品質優良技能善巧之工徒為首務，而高級人員之訓練，似須仰賴於美國。且實行平均地權之後，若干大地主由舊地而來之資金（或公債），正可投資於工業，其由國家或地方公營者，可仰給於公債及外資。中國之工業基礎，當然以民生與國防為二大目標，後者須求精新，而前者不妨粗陋。工業建設之初期，當然以供給自用為主，除特種大宗物產，應以我之有餘，補友邦之不足。此外，並不希望向外發展以與友邦競爭。但重工業及輕工業所需之機器，仍須求助於工業先進之國家，而美國在大戰期間所擴充之工業設備，及其生產大可讓渡於中國，以供發展中國工業之用，此又中美兩國在工業方面之必須聯繫也。

此外我國交通設備之幼稚，農業生產之低能，今後大規模之改進，尤須賴美國之援助，久爲世人所共曉，但戰後中國經濟之開發，必須具有下列之各條件，即：（一）統一而健全之政府；（二）和平而自由之政局；（三）完整而嚴密之經濟政策及施行之計劃；（四）大量之資金及工具；（五）多數之技術人員及優秀之勞工；概括言之，首須自國努力，方能得友邦之大量協助，如欲迎頭趕上，又必須以政府健全官吏廉潔爲前提，此則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因此作者擬提出下列之建議，即：（一）政府方面，應組織一全國之經濟會議，以決定經濟政策全般之大方針及施行之次序；（二）社會方面，應組織一中美經濟協會，以研討中美及世界之各項經濟問題，以供政府及全國經濟會議之諮詢；（三）全國經濟建設之整部計劃，應由中央設計局按照各個經濟中心區域之所需所能，分別製定方案，並使經濟協會有參預之機會；（四）應分全國爲若干經濟中心區，每區之中，在可能範圍以內，必須自給自足，並具有其本區之交通網，以聯絡本區及鄰區之各大城市間之相互聯絡；（五）全國經濟建設方案作成之後，向美國商訂建設借款，由中美兩國政府，指定財政機關合組一資金委員會，專司建設借款之實行及投資之介紹指導，此項委員會內部分，可分組工礦、農林、漁牧、交通、商業、水利、合作、都市工程各委員會，以分掌

各部分之貸借事項；（六）中國政府授權於資金委員會，使對於借款（實物在內）之支出，有權稽核；（七）每種建設公債，概須作成其還債之確實計劃，即由該項建設事業之盈餘中籌還，如其某一項事業不能按期償還其所應付之本息，可由他項事業之償債尚有盈餘者爲之分擔；（八）東三省尤堪爲國際投資之中心，而以美國爲領導者，東三省當然爲經濟中心區之一，此區中之各項工業皆有絕大資源，尤堪經營大規模之農場，似可以美國最新式之方法，積極經營，此則又與我國國防有密切之關係者也。

四 社會方面之中美聯繫

中美二國之文化接觸始於政治經濟方面，而繼之以社會方面，後者尤爲美國之所注重，而其影響於我國之文化，亦比之政治經濟更有絕大關鍵。今後欲增厚二國之文化關係，尤須注重於此一方面，以與政治經濟相配合，其基礎乃克鞏固而永久，其範圍乃克擴大而深入，試從中美訂立條約，及從條約而發生之社會方面各種接觸，而略述其經過如下：

甲、締約經過及其內容要點 中美締約始於公元一八四四年（即前清道光二十四年），先後十次，摘要列表如下：

訂約之序次	訂約之年月日	訂約之名稱	條款之數目	簽約人及地點	備考
第一次	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	三十四款	耆英 Caleb Cushing 廈門	
第二次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中美和好條約	三十款	花沙納桂良 W. B. Read 天津	亦稱天津條約
第三次	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日	中美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十款	花沙納桂良 何桂清 W. B. Read 上海	
第四次	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美續增條約附解釋	八款	志剛 孫家穀 蒲安臣 W. H. Seward	
第五次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美續修條約附立條款	四款	寶鑾 李鴻章 J. B. Angell, J. T. Swanwick, W. H. Prescott 北京	
第六次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七日	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	六款	楊儒 W. Q. Gresham 華盛頓	
第七次	一九〇三年十月八日	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	十七款	呂海寰 盛宣懷 E. H. Conger, J. Goodnow, J. F. Seaman 上海	
第八次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	二條	朱子文 J. V. A. Mac Murray 南京	

第九次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美公斷條約	三條	伍朝樞 Henry T. Stimson	華盛頓
第十次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	中美新約	八條	魏道明 Cordell, Hull	華盛頓

以上歷次所訂條約之內容，除駐使、設領、通商、招工、傳教而外，頗注意於社會文化事業。例如第二次之中美和好條約第二十五款，有「美國官民延請中國士民教習語言並幫辦文墨及採買中國書籍」之規定；第四次之中美續增條約第七條，有「中國人欲入美國官學學習各等工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律優待」（美人在華入學亦同）之規定；並有「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指准外國人居住地方設立學堂」（中國人在美國亦同）之規定；第七次之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第十一款，有互相保護對方人民之版權之規定；及准許華人繙譯美國書籍之規定。

乙、中美人民之社會的接觸。社會接觸之有關於文化者，不在駐使設領通商招工，而在宗教醫院學校三項，請分述如下：

(1) 宗教關係。一八二九年美國教會（公理會）始來中國，主持者為貝滿（Bridgman）先生。一八三二年始設印刷廠於廣州，名曰 Bruch Press。美商 Olyphant 之船，

容許美國教會人士往返中美之間，免收船費，由此百餘年來，我國之名都巨邑，大都設有美國各派之教會及救世軍青年會等組織，且大都附設有醫院或學校，與傳教事業相輔而行。

(2) 醫藥關係 一八三六年「教會醫學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由長老會牧師 Parker 及公理會牧師貝滿等諸人發起組織，至翌年，乃實現。其附設醫院之創立，則先於醫學會而於一八三五年十一月成立。其後繼起之醫院不可勝計，而以北平之協和醫院，規模組織最爲偉大，設備建築爲東亞之冠。抗戰以來，美國紅十字會美國醫藥助華會對於我國醫藥之供給，及醫學教育之補助，其功實不可沒。

(3) 教育關係 耶魯大學畢業生白朗 (Samuel R. Brown) 於一八三六年來華，二月二十三日行抵澳門，始習華文。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創立一學校，以訓練繙譯人才，初僅有學生十八人。五口通商以後各教會紛紛贖資設學，規模小者則附於教會之中，規模大者則獨立於教會之外。其初嘗以佈道爲主要目的，其後乃趨重於教育，其中初等中等教育之學校，爲數甚多，近年以來高等教育之大學，由美方資助者共有十五校，即聖約翰大學(上海)，滬江大學(上海)，東吳大學(蘇州今遷古岡)，金陵大學(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齊魯大學(濟南)，燕京大學(北平)，(以上四校

今遷成都），協和醫學院（北平），輔仁大學（北平美國天主教派所設今由同教派之德人維持之），嶺南大學（廣州今遷古岡），之江大學（杭州今遷邵武），華西協和大學（成都），福建協和大學（福州今遷邵武），華中大學（武昌今遷大理喜洲），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州今遷南屏），以上各大學以及若干教會附設之專科學校及中學多與美國各大學結有聯屬關係。例如：

(A) Carlton-in-China 自一九〇三年在中國山西省汾州設有汾州中學（隸屬公理會）有美國教員二人，每人年薪美金一千元，由母校學生會捐助之，此校現移金堂。

(B) 哈佛燕京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總社設於哈佛，分社設於燕京大學，並於金陵華西齊魯嶺南華中福建協和各大學中，附設中國文化研究所或國學研究所，其經費由哈佛燕京社資助之。

(C) 銘賢專科學校 (Oberlin-Shansi Memorial) 乃美國歐必林大學畢業生捐款創設（原設山西太谷今遷四川金堂），歐必林大學之一二三年級學生集資，於四年級學生中，推選二三人來華，為銘賢專校擔任教授，以三年為期，期滿回其本校，在研究院繼續研究一年，銘賢之華籍教授，每間二年，亦得選送一次，赴美研究。

(D) 密梭里——燕京基金會 (Missouri-Yenching Foundation) 擔任維持燕京大

學之新聞系經費，並交換學生。

(E) 史密斯女子大學 (Smith College) 該校學生服務基金團，每年捐助美金四千元，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英文系聘請教授之用。

(E) 威魯斯烈女子大學 (Wellesley College) 因蔣夫人係該校一九一七年畢業生，因之該校同學每年捐助美金三千七百元於燕京大學，一九四二年六月由該屆畢業生集資，正式成立宋美齡女士基金團，將在該校促進中美教育關係，而得其益者將為燕京大學。

(G) 耶魯大學 (Yale-in-China) 自一九一三年耶魯大學畢業同學會集資捐助武昌華中大學理學院雅禮中學及湘雅醫學院，於每年畢業生中，選二三人，至雅禮中學，擔任英文及歷史之教課，以二年為期。

(H) 哥倫比亞大學 與燕京大學交換學生，業已五年，美人來燕大者二名，由燕大送美之中國學生三名，各以研究二年為度。

(I) 康乃爾大學 (Cornell-in-China) 於一九二〇年設立，自抗戰後曾集資捐助金陵大學。

(J) 西拉邱司大學 (Syracuse-in-China) 於一九二一年設立在美以美會之國外佈道

會指導之下，在重慶設立該大學教會單位之學校教會及醫院。

(K) 嶺南大學 有交換學生制。

丙、改良社會之三大工具 改良社會必須從教育着手，此為古今中外之所公認，無俟詳言。宗教醫藥，須與教育相輔而行，同負有改良社會之責任，此點或猶未為大多數人之所認識，東亞民族於此尤多忽略，而美國人士則了解此義，彼最初移居之清教徒，旨在爭取信仰自由，與為求溫飽而遠適異域者，志趣不同；其後又能擴大此旨，以宗教補助教育，故教育之進步愈以加速，亦愈臻穩固。美人來華傳教者，每設學校及醫院，故宗教醫藥教育三者相輔而行，互為表裏。作者認為美國人士之來華佈道、治學、行醫，實出於推己及人之博愛心理，與彼「皇軍」之利用宗教以相誘惑者不同；亦絕非藉口曹州教案而攫取膠州灣者可比，中國今後不但對於友邦人士所經營之上項事業，應為扶助保護，以資擴充光大，而且中國教會人士，更應自動的擴大其組織，附設學校醫院，以與固有之佛回諸教，同負社會改進之責任，同時政府對之亦有督導獎勵之必要。

丁、如何促進中美二國之文化關係 美國以民主的社會為民主政治之基礎，與歐洲中南美各民主國之以少數階層支持其政治制度者不同。故今後之中美聯繫，除於政治經濟二方面努力推進外，更須於文化方面加緊聯繫，惟有國民外交有廣汎親切之結合，而

後兩國國交，乃能持久不渝；亦惟有文化溝通，乃有以鞏固其政治經濟之事業基礎，而為更有力更有恆之推進。作者以為促進中美二國之文化關係，首應由兩國政府簽訂中美文化協定，而後依據文化協定條款，以推進各項文化合作事業。

(1) 簽訂中美文化協定 「美洲維持和平會議」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阿根廷都城簽訂一文化協定。其目的：由於互換教授學生之方法，以及「輿論界」與「權威者」之組織連繫，以謀汎美各國人民間團體間之互相了解，並企圖造成一較為鞏固的汎美教育之團結。美國又於一九四二年以來，先後與英中蘇比諸國訂立互助協定，以技術物資接濟對方，救濟其困難而增加其抗戰力量；所有協定條款大略相同，其第七條尤諄諄於促進訂約國雙方之經濟關係，使兩國同受其利；同時並改善舉世之經濟關係。且歡迎同志願之國家自由參加，藉國際性質及各國國內之適當措置，以增加生產使用交易消費為世界人類幸福之物品。我國應仿照上述兩項辦法，與美國訂立文化協定，以為促進兩國文化關係之樞紐。

(2) 重要大學互設對方之文化講座 凡一民族各自有其特色，中國以五千年古國，屢仆屢起，美國以百餘年之新國，而躍為世界領袖，是皆有其不同於衆之特點。究竟既往文化之源流如何？今後如何溝通損益，以期採他方之長，補己方之短，胥有待

於研究比較。美國大學之研究中國哲理歷史及現代政治經濟社會之實況者，業有萌芽，而中國大學之此項講座尙未設置，亟應從速設立，互相交換。各大學之相互間，須作成有系統之交換計劃，勿使重複或偏枯。

(3) 教授助教學生之交換 同爲研究某一門類之學問，但因所處之環境，所採之資料，所抱之旨趣，各有不同，因而趨向程度，遂不免有差別。故交換教授助教學生乃爲互相參證之必要條件。紐約之國際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爲主持國際間教授學生交換之機關，但向來側重歐洲與中南美，今後亟須擴大範圍，而包括中美間之交換；我國方面亦應有同樣之組織以促進之。此項之交換，人選宜嚴，待遇應厚，居留之時期至少應有二年，以免淺嘗輒止，而更求其專精。

(4) 補助高深學術研究 美國財力豐富，如羅氏基金董事會，卡尼奇和平會，哈佛燕京社之類，或研討全世界之事物，或專研東方之歷史語言，而中國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所應研討之點，當更比他國爲多，且有若干研討，彼此俱有利益，美國對於歐洲各研究機關，前此每年均有大量之資助，今後對於中國國內高深學術之研究必更密切注意，而予以若干之便利，美國方面所需之研究技術，以及研究之對象資料，中國當可源源供給，似此雙方合作，兩國均有裨益。

(5) 中小學教科書應加入關於對方之文化史料。兩國既思親交合作，必須使兩國國民相互了解；而欲使國民相互了解，必須首先講習對方之歷史地理以及社會組織。但負責取材之人，如囿於一隅之偏見，或故為惡意的中傷，因而造成不公道之抑揚褒貶，而埋沒其實情真相，勢必使觀察者陷於煙霧之中，而不能明其真相。中美雙方之政府與國民間同須負起此項重大之責任。太平洋戰事發生以後，美國有志人士，鑒於中美文化合作之重要，爰有亞洲研究委員會 (Committee on Asiatic Studi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之組織，由哈佛大學教授 Howard E. Wilson 主持其事。其重要工作，則為在中小學課本中增加關於遠東之史地教材。中國方面，亦應有同樣之組織，分工合作，俾中美文化更能溝通。

(6) 藝術展覽。藝術最足以表現其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發展之程序。我國之銅器、玉器、石刻、木簡、書畫、絲繡、雕版、以及漆器瓷器之類，久矣膾炙人口，稱為世界最有價值之藝術物品。今後應仿上次送往英倫藝展之先例，分類精選，於縱的世界上，橫的區域，均作成有系統之陳列，並為考其變遷沿革，作風方式，作成英文說明書，以便西方人士之觀覽。

(7) 繙譯名著。吾人欲求科學化，現代化，必須廣求知識於世界，繙譯名著，乃

其中之一端。美國學術界之造詣專精，或視英人德人爲有遜色，然能注重實用，不尙理論，故最適於實際應用。而我國之於實際應用，最爲缺乏，故更應效法美國，以補我之所短，理工農醫各部門，尤爲特然。自應就我國需要之緩急輕重，作成有系統有計劃的繙譯。我國之古今名著，亦應繙成英文，凡文字古奧理論玄妙之著作，苟無註釋訓詁考證之助，豈易通曉，吾人應協助美人從事選譯，俾有志漢學者易覓門徑，倘能繼續出版，大可供西國人士之研究，又不僅美國一國而已。

(8) 教育電影之大量輸入及交換 電影對於人類之感動引誘力量，異常偉大、迅速、而且深刻。在教育幼稚師資缺乏之吾國，尤應善用之以求速效。美國電影極其發展，但良莠不齊，亟須善爲選擇，或請美方製成適合中國之教育電影，大量輸入，收效必宏。吾人尤應精選中國文物史地之資料，用最新的科學編輯方法，製成影片，贈予美人。

(9) 醫院之相互運繫 醫藥衛生應與教育事業相偕並進，此點應以美國之普遍爲法，而不必求其美備。且我國之國醫，亦自有其特色，今後應以科學之研討，光大固有之祕傳；製藥方式，亦應改良。美國人對於各種學問制度，恆在試驗變遷，故其醫學亦屬五花八門，無式不具，我國之醫藥，如能用科學方法，加以整理，亦必有所貢獻也。

(10) 兩國學術團體以及學者間之連絡。學術團體連絡力量最爲偉大，而專家權威者之聲氣廣通，力量尤爲雄偉，今後所有學術團體，類如工程師學會、醫學會、農學會、政治學會、經濟學會等等，應與美國之同樣團體，相爲連絡，不僅增厚感情，兼以交換知識，而促進中美之文化合作。美國各方最近對於蔣夫人之熱烈歡迎，概非尋常所能比擬，此點允宜更加培厚、更爲推廣，以爲國民親交溝通文化之一助。

施行上述各條，又有一前提，即美國方面應努力於：(一) 改訂移民律，使赴美之華人易於入境。最好由雙方政府訂一特約，使兩國人民易於改變國籍。中國方面，則應對於事務方面，力求改進。組織必須統一，精力必須集中，萬不可紛紜歧出，釀成政出多門之病。業務進行，應以科學的方法，相其輕重緩急，訂一較長期之進展程序，但亦得視環境與時代之需要，而酌量變更，並應責成學術團體主持其事，始終其事。

五 結論

要之，文化之一切表現，胥以思想精神爲本，而思想之變遷又視教育爲轉移。教育可以改良社會，有健全之社會，然後政治經濟之基礎乃能鞏固。美國本此道以爲治，故有今日之強盛，中國社會雖有幾度由於開明政治加以改良，旋又爲暴君專政所破壞，今

後實行三民主義，應仿行美國之政策，以培養德性爲民權之基礎，以建設經濟爲民生之基礎，以調和社會爲民族之基礎。中國今日已進爲世界大國之一，且與美國同爲民主國家，同爲保衛太平洋和平之二大支柱，故中美之文化尤有連繫溝通之必要。

中美文化協會叢書

(一) 美國雜誌選譯 (第一冊)

本書譯載羅斯福夫人、拉鐸摩爾博士、賽珍珠女士、戴維斯氏等名作二十八篇，言論正大，記述翔實，譯筆流暢，凡關心美國輿論及國際現勢者，不可不讀。定價每冊十四元。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二) 大同主義之研究 王之平著

本書作者研究禮運春秋有年，對於大同理想尤具精闢之見解。茲篇首對禮記禮運篇百零八字作簡括扼要之說明，次述孔子作春秋之本意，次以圖表顯示大同主義之內容及適用範圍，再次比較大同主義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之優劣，最後結論大同主義為拯救世界唯一之聖劑，詞簡意賅，凡有志研究大同主義精義，促進世界永久和平者，均應人手一篇。定價每冊四元。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三) 孔子學說 (英文) 蕭公權博士著

本書扼述至聖先師孔子之生平及時代背景，闡釋孔子正名仁愛經世濟民等中心學說，提綱挈領，得其奧旨。卷首由孔會長賜序，明示孔子學說 國父遺教與世界和平之關係，尤為名貴。書末載何永信博士補充論文，內容益臻完備。為中美人士研究孔子學說最優良之英文讀物。定價每冊十元。外埠函購另加郵費。

發行者：中美文化協會 (重慶上清寺)

經售處：天地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一九二號)
各地各大書局及雜誌公司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By DR. SIH-KONG CHEN

- I. Introduction.
- II. A Sketch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 III.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 IV. Th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Functions of an Institut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 V. Looking Forward.

I. INTRODUCTION

To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the present essay,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terms of the subject from the outset. By "Chinese," of course, it denotes all that belongs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land claimed by the Chinese Republic. "American" is not lim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includes Canada and all that belongs to the so-called Latin-American countries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s. "After the war" sets the time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hostilities in this world war in both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theatres and thereafter.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culture," the present view accepts Professor Bronislaw Malinowski's definition: "Culture," says he, "consists of the body of commodities and instruments as well as of customs and bodily and mental habits which work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human needs." Or "culture," as he also defines it, "comprises inherited artifacts, goods, technical processes, ideas, habits and values;" Cultural relations are those which com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With such inclusive definitions, it is worth while to review the basic issues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total situation. It has never been more accurately observed and better stated than by the facul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Universities in their recent Messages to Teachers and Other Men of Learning in China. This says:

"Among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the modern world have been those changes in European civilization of which the Reformatio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technique, and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have been 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igns. The resulting expansion of the white peoples gave them a cer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ir multitudinous discoveries in applied science are becoming the common property of the world, and cannot but have in time vast effects upon

the standard of life of all human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cultural contact and penetration the Chinese (as well as other peoples) have been stirred to explore from new angles the values of their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and arts, and their distinctive aptitud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detailed cultural outcome of these processes no one can foresee, but in all the interests of human progress it behoove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of East and West to join more closely than heretofore in correlating their knowledge and traditions.”³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can assume proper implica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only in such broad perspective as this statement: That is to say, the purpose of fostering cultural relations is “to join more closely than heretofore in correlating knowledge and traditions.” Or in the words of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Oxford faculty, “that the proved excellencies of each culture may come to greater fruition through the service of the common good.”⁴ That is to bring about the harmony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two cultures to satisfy human needs in the new age after the war.

In other words, the task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s to build a foundation for a new culture out of the tw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ultures in rapidly changing conditions after the war to meet the total life needs for the common good. It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a unity and a harmony of two cultures for a better world and happier life.

II. A SKETCH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PAST

As early as 1784, the ship, "Empress of China," flying the American flag appeared in the waterfront of Canton. The Boston tea traders were well know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ny clipper ships including the well-known "Rainbow" were known to sail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oing prosperous trade.° Hardly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have passed. The imports of China from U.S.A. in 1937 exceeded one hundred eighty-eight million dollars, equal to almost twenty per cent of the total exports to all countries. For comparison, imports from Japan and Germany were both slightly less than sixteen per cent. That of Great Britain was only about twelve per cent. Those of Spain and Portugal had been reduced to insignificant percentages. Exports from China to U.S.A. had in 1937 grown to two hundred thirty-one million dollars occupying twenty-eight per cent of the total exports, while those to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amounted only to 8.6%, 9.58%, and 10% respectively. From these facts, it is clear that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A. alone has assumed a position of growing importance surpassing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In 1847, the Church in New England was able to secure and to support three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U.S.A. Yung Hong was among these first ones.

In 1854, he was graduated from Ya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870, selected some thirty of the ablest young men in the empire and sent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foreign training, and followed this number by additional thirty in 1871. But in 1881 the reaction set in and they were all recalled. In 1908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d enacted to return all Boxer Indemnity Funds to promote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1909, the first large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was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hat fund. The funds are now in the hand of the trustees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rom 1925 on there have been usually not less than from twelve to eighteen hundre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ies in U.S.A. and Canada.⁷ There are in U.S.A., Hawaii and Canada the following number of students:⁸

<i>Year</i>	<i>No. of Institutions</i>	<i>Men Students</i>	<i>Women Students</i>	<i>Total</i>
1936-37	275	1,610	552	2,162
1937-38	272	1,654	684	2,338
1938-39	314	1,657	696	2,353
1939-40	263	1,542	695	2,237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no less than eight thousand Chinese students returned from America in various fields of work in China.⁹ They are carriers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bridges between the nations.

The Nestorians and Jesuits are known to have come in T'a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ir influence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astronomical sciences and Christianity. In modern time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on, took place in 1807 on board an American ship. He found his first home with American merchants in Canton. 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ary, Elyah Coleman Bridgman, was sent by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in 1829. The first missionary school began in 1818 at Malacca. The first medical missionary, Peter Parker, arrived in 1834.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as founded in 1844. Now in less than one hundred fifty years, the number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as grown to 5,972 in 1938 or the all time highest number of 8,325 in 1926. The Protestant Church had, in 1938, 173,228 children in her elementary schools, 43,879 pupils in her high schools and 5,858 in 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e gave in 1938, 4,808,603 treatments to 1,561,908 patients. She spent in 1938 about five million U.S. dollars for the evangelical,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work. These figures do not include the activities b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1937, the Catholic Church had 2,679 missionaries and 2,224 medical missionaries. She took care of 97,898 patients and 6,839 aged people in 267 hospitals and institutions. She had 52 colleges. She had 17,075 boys and 9,520 girls in her 252 high schools for boys and 180 for girls. She had 121,736 boys and 108,331 girls in her 11,163

catechetical schools. No fair-minded person can ignore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ave had on the cultural relations.'°

“Another cause of good-will among the Chinese toward Americans is the work undertaken by the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 The Commission aims to develop in China scientific sanitation, and thus place the Chinese within half a century upon a par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this line. The Commission is now authorized to expend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per year; and the expenditure probably will presently exceed this large sum. The people of no nation ever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have made so large, so thoroughly scientific and so constructive a contribution to the physical welfare of another nation.”’

“In accounting fo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 must not overlook the efforts of American ministers, scholars, diplomats, presidents’ representatives in Congress, writers, political advisers, representatives, consuls, missionaries, Chinese officials and missionaries and those who made hasty trip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king in 1927, China had continuously made use of specialists from U.S.A. in public health, monetary system,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griculture, military sciences and many other fields.

They have and will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in the cultural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III.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Let us lay dow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assumptions upon which the policy, the organiz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gram of an 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Firstly, culture so broadly conceived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as to include all artifacts made by men and customs of human relation should not narrow itself to any one area of human experiences. It should deal with total life experiences. It should deal not only with art, music and literature but also with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science. Science on the one hand includes the so-called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so broadly conceived and correctly stated as by the Cambridge faculty members gives a clear relation of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a desirable direction. It says: "In Cambridge science has never been thought of in a narrowly technical sens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have always been kept in mind. It would be great tragedy if China were to accept the science of the West simpl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 motorized civilization. . . (but) to attain a wider conception of

scie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and culture, destined indeed to make men the masters of their environment, but link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all rational thought about the universe, and needing in its applications, if not to become our destroyer, the guidance of that morality and virtue of which your (Chinese) sages have been among humanity's greatest exponents.'''²

In other words, the task of an institut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s on one hand not merely to touch the surfac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 by centering its interest in hospitable and friendly contacts. It is, on the other hand, different from an ordinary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makes studies on a narrow specialized field for a simple academic interest. It is neither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club nor an Academic Sinica though both of them have performed very useful functions in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 and cultural relation.

The task of promoting better cultural relations should be original, comprehensive and unified. It is an original task as it performs a unique function in cultural evaluation and synthesis. It is a comprehensive task as it includes all areas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cultural diffusion and emergence. It is a unified task as it maintains its unity instead of scattered and discontinuous efforts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e new changing and emerging cultures.

The second assumption on which this essay is based is the fundamental belief in human value. It is believed that individuals have supreme value; freedom, in so far as this does not limit that of other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social actions and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nd ideals are to be preserved. Whatever curtailments of these fundamental human values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war are to be removed after the war. The course of cultural relations cannot be dictated by a single person nor even by a small group of wise men. An atmosphere of free and open discussion should be preserved. The organization should remain as a private organization, open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it. No one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membership or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ations because of his pronounced political, economic or religious beliefs.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task of those working to improve cultural relations should however be abov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concepts. Any individual and any social group may lend their support financial or otherwise, without attempting to curtail the institute's freedom of action, to direct its policy or to influence its program.

Thirdly,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safeguard cultural relations from any assumption of racial or

cultural superiority. Cultures are different ways of satisfying human needs. They are equally significa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is to seek reciprocal effects upon each other so that new and changing needs may be met. No culture is superior to another cultur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time, the situation and the effect on the people. The new emerging culture in meeting the new needs and world view may resemble neither of the converging cultures in many ways, destroying many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and upholding many of the significant features in the new direction of human destiny.

For instance, nationalism and capitalism are products of European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ariff restrictions have been built on a narrow economic view which has in some way led to this present war. After the war all nations should have arrangements for free access to trade and raw materials. There should be close collaboration of all nations in economic fields to secure improved labor standards, economic advancements and social security, so that a peace free from fear and want may prevail and a new and better world order may be founded.

Fourthly, to safeguard a permanent peace after this world war, there must be a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Wang Chung-hui, "has failed because all govern-

ments and peoples have lacked faith and trust in it. To remedy this,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o advocate moral disarmament or to build a psychology of peace. The extreme nationalistic education of all nations has brought hatred among people toward other countries and encouraged international war."¹³ He consequently advocates a system of close censorship of books, periodicals, movies, broadcasts and other means that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causing international ill-will. Our Ambassado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 Dr. Wellington Koo, has said the problem of peace after the war is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geography. Unless we collaborate to study the peace problem now and co-operate in the future, the peace structure cannot be realized after the war."¹⁴

Thes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and proper cultural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A., the two great nations in the Pacific.

Fifthly, the main function of such an organization as the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its direct services to the public. It should, as it has admirably accomplished, render services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by providing reading rooms, running a hostel, arranging lectures, translating current literature, arranging broadcast programs and other services. It, however, would be deplorably short-

sighted if its services were confined to this range. The Institute should serve as a clearing house to co-ordinate all the activities and the resources in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s available in order to build toward closer and better cultural relations. In as much as it is able to mobilize and take the lead in world-wide interest in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at much it succeeds in freeing the movement from the limits of one institute and in drawing its reserves from the world-wide community. Its function should, therefore, be promotional as well as demonstrative. It should give assistance and recognition to individuals and to other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been giv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V. TH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FUNCTIONS OF AN INSTITUT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e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had an admirable beginning due to the unselfish and devoted sacrifice of its founders and supporters. To meet the need and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war, it has to be re-organized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legitimate ever-growing function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deal thoroughly and systematically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work of an Institute to promote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e membership should be open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As it is an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cultural relations, membership which does not entitle any one to any special privilege, there should be no undue restriction as to the membership. To safeguard the homogeneity of interest, there may be some requirements for initiation such as residence in an American college, nomination by two members or some other simple requirements. There should be an annual assembly of members and financial and other reports given. The elec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is assembly should be by members and from the members at large. One thi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ould be retired at each election so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continuity as well as fresh members in the directing force. The size of the Board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size of membership. It may be varied from 15 to 23 members. There can be a standing committee of from 5 to 7 members. The Board should have bi-annual meetings whil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should meet once a month or oftener.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policy and for looking after the needs of the Institute in fulfilling its missi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the Institute, however, should be in the hands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 who is responsibl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supervis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He should be nomina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pproved

and appointed by the Assembly for a term of three years.

The general secretary appoints his staff to carry on all executive functions. He should submit monthly reports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bi-annual reports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nnual reports to the Assembly. He represents the Institute in carrying out its policy, in proposing the budget, and making investig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ttee, the Board and the Assembly in the major changes of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He is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y of the Board.

Under the general secretary and Assembly, there should be a division of general affairs and eight service divisions as follows:

Division of General Affairs

Division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Division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Division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Publication Exchanges

Division of Tourist Service

Division of Motion Picture and Broadcast

In each division there should be one or more secretaries and associates as the need requires. There should be advisory committees formed to plan, to supervise

and to assist the work of each division. The committees should consist mostly of specialists. They are recommend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and approved and appointed by the Board.

Division of General Affairs:

This division consists of a staff of secretaries, the treasurer and the business manager. Beside the general affairs which usually belong to such a division, it also assists other divis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routine of their specialized work. It represents the Institute in the ordinary contacts with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s. There are many other similar Institutes of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Institute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co-ordinating the valuable efforts of all the Institutes, to increase their contribution and save overlapping and duplication of their work.

Division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The Division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investigates the situation of th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America in regard to professorships,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and teaching positions, so that qualified persons and institutions may obtain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nd promote cultural relations. The division can either secure information or finance such needed opportunities. When such opportunities are made available to qualified persons the division should offer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make best us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The division

should also follow up the person so benefited and help them to bring about the contributions in cultural relations which they are expected to make.

The division should establish ten to twenty professorial chair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It should investigate the need of various branches of cultural relations to allocate those chairs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here there are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interest for such chairs. It should raise adequate funds, for each professorship to include expenses for honorarium, travell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It should seek qualified and available native and foreign scholars to fill them. It should arrange work facilities, residence, itineraries and lecture programs so that the time of these scholars can be used to the best advantage for cultural relations. It should take care to see that a continued interest in the respective field may be stimulated by publication or other promotional activities.

It should also provide one to two hundred fellowships, scholarships and research subsidies to widen the interest in cultural studies among scholars or prominent students on specialized subjects. These opportunities may be secured by direct grants out of the fund of the Institute raised for such purpose. Or they may come from the arrangements made through the Institute on exchange basi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se arrangements can be extended from the university level, down to the high

school and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vels, so that a selected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ir teachers can have a direct experience in a different culture by studying in a foreign school and living in a foreign hom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other divisions this division can also secure and supply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material for the use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ols to promot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Fables, mythical stories, parables, folksongs, juvenile novels and literature can be translated for each other's use. Dramas, dances and music can also be rendered to promote raci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films and school broadcasts should be made and directed for the use of both countries. It should be made possible to exchange exhibits, habitat cases, and art and craft works to stimulate mutual interest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Lantern slides, film strips, posters and charts useful to schools should be secured and prepared in quantity for distribution in America and China.

The Institute should be a supply house of materials concerning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for American schools and American materials for Chinese schools.

Division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Culture, as defined by Malinowski, comprises technical processes that satisfy human needs. The cultural relations

naturally include those relations whereby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one mode of living has to be changed in view of a new way of living. The Institute is therefore interested to see those changes take place, to lessen the evil effects of such changes and to direct these changes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United States can help China enormously in her post-war reconstruction.

Such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whole world is expected by leading men both i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 Atlantic Charter, one principle stated was that after the war, all nations should collaborate in the economic field to secure improved labor standards,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W. Willkie on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poke of winning the peace by planning for "peace on a global basis," making the world "free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and recognizing the fact that "America must play an active, constructive part in freeing it and keeping its peace."¹⁵ Mile Perkins said "complete victory will not be won until there is a full and increasing use of the world's resources to lift living standards from one end of this planet to the other. . . . Full-blast production for a gradual 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will be as necessary to win the war. . . . Our number-one-post-war job will be to make it physically possible."¹⁶ Dr. H. H. Kung, the 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in his recent broadcast to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his feeling that we "ne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e her sympathetic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industri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s." 17

Kurt Bloch had rightly observed when he wrot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Directly after the war,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bably be very close. . . At the end of the war, China will therefore dispose of very large ass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urposes of reconstruction. This flow of United States dollars to the victorious Chinese Republic will probably be accompanied by Chinese attempts to utilize American technical advice." 18

The Institute can take up its responsibility to make available the full use of such technical advice from America. The Institut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its Division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should analyze the major economic and technical needs of China. The Division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should find out authorities in various fields, hold 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 make investigations and lay out plans for government and private interests to adopt them. The Division can perform its function along these lines only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echnical advisers of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Sinc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after the war will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echnical adv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generation has been very rapid, the Institute assumes a special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secure technical advisers from America to help the study, the plan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H. Hansen and C. P. Kindleberger in their article on the Economic Tasks of the Post-War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oper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plan for cheap power supply, to control floods, to work for soil conservation and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The economic task of the post-war world will be centered upon three issues: (1) to develop industry to relieve unemployment, (2) to increase production in all countries and (3) to raise standards of living.'*

In so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the post-war problems will be:

- (1)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the occupied areas,
- (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 (3) the employment of the ten million disarmed soldiers,
- (4)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 (5)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agriculture,
- (6)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s of communication,
- (7)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of flood control and cheap water supply, and
- (8) soil conservation and reforestation.

Division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Museum and library are two of the most effective institutions for cultural diffusion. In China, there is a great need of various types of museums and libraries. These institutions serve the dual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public to apply science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of supplying material to carry on research.

To promulgate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China needs various types of museums like thos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needs such museums as 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of Chicago to show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modern life. She needs such museums as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to appreciate the work and the wonder of Nature. She needs such institutions as the Franklin Institute in Philadelphia to spread scientific education. She needs at least one Planetarium like the newest one in Pittsburg to make astronomy a science intelligible to the men on the street. She needs a rich depository of scientific specimens like tha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She needs a group of collections of special interests scattered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omparable to those on oriental art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the collection of fossils in the Peabody Museum in Yale. The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cannot build up all these in a generation and all by itself. With its

cont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stitute can promote and assist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se needed citadels of learning by pooling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by offer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planning and in building them up.

There is as great a need of libraries as of museums. The Institute should have its own research library specializ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materials on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t should also assist other libraries in building up such collections. It should help to establish depositories of important publications and book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ations in all large cities in China. It should publish reading lists and bibliographies on special topics concerning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It can maintain a circulating library of a few thousand books, to be borrowed by libraries for public use in various cities.

The Institute should, through its Divisions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render services to American libraries and museums to procure rare books and specimens and to buy ordinary supplies with a nominal charge of service commission. The proceeds from transactions should cover expenses and provide a part of the fund for its own library.

Divis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in China no less than eight thousand Chinese graduates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y are in different fields of work all over the country. Most of them

occupy rather important positions. Most of the cabinet minister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ince 1927 have been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Practically all universities are patterned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American system and most professors got their advanced degrees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y are, for good or b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in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the Institute be able to guide them before they go to the States, assist them while they are there and organize them and keep them up to date in their training after they have come back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interpret, evaluate and synthesize these tw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ultures for the peoples in the midst of whom they live, they would b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c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is Institute, through this Division, should organize alumni branch associations of various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Beside cultivating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the members, the field secretary of this division should supply the members with news from their *alma mater* and keep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formed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ir graduates. If there should be visits of American professors to China, this Division should offer its services and give advance announcements to the graduates of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so that the visitors can have a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interpreter of what they see and hear during their visits.

The Division should hold annual or bi-annual conferences for alumni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problems they confront after their return to China and to seek solutions from their common experiences. The Division shoul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faculties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ose selected reading lists on general topics or on problems raised by these discussion and study groups. It may be possible to collect books from American professors as gifts to the Research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ir reference.

It may also be conveniently arranged to have a group of American professors to visit China for a summer or half year to re-educate their graduates and others who need to be brought up to date to the advances of their fields. Or the graduates may arrange through the Institute to go back to the *alma mater* to brush up their knowledge:

The Division should also assist those who plan to go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Lacking knowledge of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udents have made various mistakes even in such simple matters as clothing, landing, admission to college, etiquette or even table manners, etc., which make their visit a less pleasant one at least. Many students have made a wrong choice in picking a university or have had to change their university or their major field after they have wasted a good deal of time. The Division with the help of their alumni

connections can easily help in these matters. It can actually offer a short course of two or more weeks to an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udents as these usually start in the fall of every year. The Division can also make arrangements at the landing port in America to make the landing pleasant and the travelling profitable, economical and well taken care of. The Division,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such organizations as International Houses, Churches, Friends of China, Y.M.C.A's, Y.W.C.A's and China Institute can make advance contacts to make a visiting student an expected guest.

When Chinese students prepare to return, they usually attempt to see all that they have not yet seen and to take all that they think will be useful to them. Their itineraries and luggages are literally packed too full. The Division should help them through the field secretary to be discriminative, to plan ahead and to build advance contacts so that they can get maximum benefit from their limited time and moneys.

After they return, they oftentimes have to lose time in vocational adjustments. The Division could have made advance and authoritative announcements concerning the returning students to the potential employers. Though some of the students have jobs offered to them before they go abroad, this,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ould never change their inclinations in the meantime. The Division could thus render a great service by helping in these vocational adjustments.

The Division should also, through making available the use of books, films and projectors, charts, diagrams, statistics, specimens and other materials, help as much as it can each individual to be an efficient worker and able interpreter or critic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both when they are abroad and after they return to China.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The Institute, as a rule, should not attempt any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It cannot be a full-fledged research institution as its field is so broad and its resources are necessarily limited. Furthermore it will defeat its own purpose of promotion of interest in cultural relation by doing what other institutions can do or do better.

The Division, however, can advantageously make studies of such general nature as allocating the issues of any problematic areas, evaluating the work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competent to do the needed research, providing fund and personnel to endorse research projects and making use of them in total or in part. It is a division doing research on researches.

The Division can also render service to direct questions of cultural relations proposed by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merica to those competent individual specialists and institutions who are able to answer them.

Through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 of special bulletins, the Division can publish the result of such researches and queries.

Division of Publication Exchanges:

This Division attempts to co-ordinate the work of exchange publications now carried on by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nd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s. There is a wasteful and meaningless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 to and from America. If these conditions should be allowed to exist and to continue, they will lower the value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th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Division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make a thorough-go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t status and draw up a list of librarie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which can efficiently and conveniently serve as depositories in China and America to receive non-commercial publications gratis. Of course, any institution may give beyond this basic list of depositories gratis or on the exchange basis.

The Division should publish lists of publications available and the names of the depositories in which they can be found. The Division can study the need to translate or to make a digest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It should use discrimination to do this work itself or to find auxiliary agencies to do it on a self-supporting basis.

Division of Tourist Services: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pend great sums of money to publicize and to facilitate and to increase the enjoyment of foreign tourists. Some countries take this as a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others leave this to private and commercial agencies. In China, where travelling facilities and conveniences are so scarce and commercial agencies so few and inadequate, there should be some non-profit-seeking institution rendering services to those visito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e Institute could through this Division render a much appreciated piece of service to tourists with a serious purpose of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relations. In one sense, these tourists will be potential ambassadors to promote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ivision, beside the usual routine of making travelling arrangements for tourists at cost, should map out a few general routes for those who want to see "real China," not a few of the harbors and coastal cities. Such routing should include not only citi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such as Peiping and Nanking but also ordinary cities like Soochow, Hangchow, Changsha, Chengtu and Kunming. Itineraries should not be over-crowded but should include brief stays and ample interviews. The Division should make allowance and give time for personal interests. Whenever possible, the Division should attempt to build

personal contacts and friendly relations for tourists who may be invited to homes on social occasions such as birthday parties or weddings.

There may be necessities to organize the tourists into groups of different interests. They may be conducted to various special points of interest. A series of lectures or a short course can be offered to them by specialists. Or a summer school may be organized for tourists such as in Mexico.

The Division can take initiative to promote various missions to attract American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eaders to come to China for the common good. An Industrial Mission composed of leading American industrialists may be organized to study China as a market. A Financial Mission may be organized to study China as a field for investments. A Religious Mission may be organized to re-evaluate missionary enterprises to meet new needs. An Educational Mission may help to make critical observation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to assist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 war. Labor problems, housing projects, public health work,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s and numerous other problems can all have light thrown on them by groups of visiting specialists.

Division of Motion Picture and Broadcast:

Projectors and radios are two of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s for communication of ideas. They are manufactured in mass quantity and widely used in the

U.S.A.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ovie theatres, over seven hundred broadcasting stations and five million radio sets. China, after the war, will eventually possess to a satisfactory extent these modern instruments of communication. China perhaps will before long attempt to make her own films and receiving sets comparable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to those of the U.S.A.

The Institute should possess facilities to produce films and to prepare broadcasts to deal with subjects related wi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ese materials should be prepared not only for arousing community interest but also for school use. The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America.

Films can be made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subjects:

1. History and historical plays,
2. Geography and travel,
3. Handicrafts and industrial processes,
4. Home and Social Life (marriages, funeral festivals, etc.),
5. Agriculture,
6. Recreation (boxing, kite-flying, fishing, sailing)
7. Cooking and dramatic arts,
8. Current events and news stories,
9. Reconstruction work and projects,
10.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1. Nature study.

The broadcasts from the Institute should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programs:

1. Lectures on cultural subjects,
2. Discussion and panel discussion on Chinese problems,
3. Town Hall on the Air,
4. Drama,
5. Music,
6. Speeches by dignitaries,
7. School broadcasts,
8. Book reviews,
9. Talks to children,
10. News and news comments.

V. LOOKING FORWARD

W. Willkie said on his return to U.S.A., "We must plan now for peace on a global basis." Only by preparing for the peace can we secure the permanent peace we desire. The aboli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has already laid the cornerstone of equal and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A. Before the cessation of the hostilities,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and U.S.A., should consciously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of world peace by rendering a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re should be discussions held by the intellectuals,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leaders as well as diplomats and statesme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after the war. There should b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commissions to study, discuss and

plan for new and more satisfying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results of such 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peace settlement. One of the leading tasks is to plan a large-scale rehabilitation of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orce for world peace.

There should be an Advisory Board to assist the gradual realization of the plan of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na after the war. Such a Board should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dvisory capacities carrying out needed investigations, mapping out tasks, making recommendations, providing and training personnel and securing co-operation to realize such plan. Such a Board should be promoted and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serve as an unofficial body in assis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various ways.

The financing of such an Institute to realize its enlarged and multiple functions would be a problem of no small magnitude. No one can foresee all the resources that will be at its disposal. It will have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upport when the Institute proves its worth. The Institute, in order to realize its full and best service, must lay down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it should maintain its freedom in interpreting,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cultural relation unbiased by the views of outside financial supporters.

The Institute should continue to secure and to enlarg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patrons from the banking and business interests and from the Governments. It should aim at securing large endowments from private foundations to stabilize its source of regular incomes. The contributions from enlightened business interests will increas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scale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after the war will far surpass that of the pre-war period, but also that the money thus spent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and the increase of investments. The governments will naturally assist in such a cause as there are no other social groups rendering a greater and more valuable service, free and voluntary, for the governments to adopt and to make use of than those offered by the Institute.

There should be a large and dependable source of income beside the above three:

"It seems," says Kurt Bloch, "worth conside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principles to some of the outstand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war loans to China. Other nations might be expected to join in the enterprise. By utilizing such funds a powerful Sino-foreign agency could be created which might utilize its means equ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for famine relief." It may not be desirable that the Institute should be the agency to dispose of the return of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of war loans by foreign powers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war. It is highly recommendable that a sizable portion of this money be directed to the furtherance of cultural relations as planned in this paper and carried on by the Institute.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as contemplated by this writer will require a large and dependable source of income like this:

Before the actual cessation of the war, the Institute should lay the ground work by arousing popular interest, establishing branches in China and America,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personnel and preparing for the enlarged program after the war. The Institute should also launch a program preparing public opinion to accept the position of the Institute in fulfilling its task. It should send a delegation to assist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so that the terms of the peace treaty should offer potential facilities and workable conditions for better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1: Encyclopediã of Social Science, p. 626.

2. *Ibid.*, p. 621.

3. Cf. "A statement by a group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ambridge addressed to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other scholars in China concerned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British 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1942, and see also "A statement by some teachers in

Oxford to those teachers and other men of learning in China who are concern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more particularly that better training should be given in philosophy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 achieved of the relation of philosophy to life."

4. *Ibid.*
5. Upton Close: "The Revolt of Asia," p. 285.
6. *China Year Book*, 1936.
7. J. W. 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p. 426.
Cf. also Paul Meng—Ehu conversation concerning Chinese students in U.S.A.
8. *Direc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36-7, 1937-8, 1938-9, 1939-40, 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 New York City.
9. Paul Meng, *op. cit.*
10. *China Year Book*, 1939, on "Religions."
11. Both cf. Bashford, *op. cit.*, 427-8.
12. *Cambridge Statement*, *op. cit.*
13. *Ta Kung Pao*, Nov. 8, 1942.
14. *Shēh Shih Sin Pao*, Nov. 5, 1942.
15. W. Willkie: cf. *N.Y. Herald Tribune*, Nov. 27, 1942.
16. *New Republic*, June 15, 1942.
17. *Ta Kung Pao*, Feb. 6, 1943.

18. Cf. Translation by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19. Kurt Bloch: "China,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War," *Asia*, June, 1942.
-

Author: Sih-kong Chen.

Academic Training: B.A.,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3.
M.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38.
Yale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1938-39.
Ed. D.,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Present Position: Professor of National College of Social Education.

RECENT 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Chungking

1.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CURRENT AMERICAN MAGAZINES," Series I (*in Chinese*). Price, NC\$14 per copy.
2. *TA TUNG CHU I*; or "THE CONFUCIAN PRINCIPLE OF A UNIVERSAL COMMUNITY" (*in Chinese*), by Wang Tse-ping. Price, NC\$4 per copy.
3. "CONFUCIUS: TEACHER AND REFORMER OF CHINA" (*in English*), by Dr. Hsiao Kung-chuan. Price, NC\$10 per copy.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中美文化協會叢書(四) 戰後中美文化關係論叢

全一册 定價國幣貳拾圓

(會員向本會購買者照價八折)

版權為
本會所
有不得
翻印

著作者

李黎非 陳錫康
樂森璧 袁同禮

發行者

中美文化協會

印刷者

重慶上清寺
重慶印刷廠

經售處

天地出版社

分銷處

重慶民生路一九二號
各地各大書局及雜誌公司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安圖字第七二〇號審查證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AFTER THE WAR

Prize Winning Essay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

Chungking, China

July, 1943

